



## 中评周刊 | 第76期目录

### 专题 | 归还生育权：破除计划经济思维

1. 盛洪：最好的人口政策就是没有人口政策 P. 2
2. 禅心云起：如何走出“低生育率陷阱”？ P. 4
3. 易富贤：不要将人口高利贷当红利 P. 9
4. 茅于軾：人口红利，人口高利贷 P. 19
5. 袁森：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 年规模或超 200 亿，去向成谜 P. 22
6. 托尼·朱特：从冷战时期罗马尼亚的人口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 P. 27

### 观点文章

1. 荣剑：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 [上] P. 32
2. 张林：应不应该抛售美国国债 P. 40
3. 张维迎：没有思想市场，世界会怎么样？ P. 43

### 随笔散记

1. 许章润：稻壳、碎石子和老鼠屎 P. 47
2. 郭于华：OMG，傻“幸福”又来了！ P. 50

### 读书

- 陈剑：请把生育权归还给公民：谁来定义生育权的归属？ P. 56

### 预告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62

- 订阅 | 往期下载 P. 64

## 盛洪：最好的人口政策就是没有人口政策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在第 456 次天则双周学术论坛上的评论]



本文作者盛洪教授

感谢梁博士刚才讨论的这个话题。上次我们也请了易富贤教授来讨论这个话题。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在想的问题是什么？刚才梁博士讲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增长速度缓慢，会带来一些不利因素。我想这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根本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上次易教授来时我也提这样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人口增长的最合理的机制？反过来说就是政府有没有宪法权力来制定这个政策？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这几十年一直在观察我们的计划生育，在观察我们的行政部门，他们自己通过宣传所建立起来的神话被打破，就是所谓的政府更有效的配置资源，尤其是更有效控制人口的事情根本不存在，甚至是相反的。所以，我觉得要特别注意。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口状态是非常糟的。政府宣称自己有能力或者“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什么，然后通过政府政策去影响民众，导致了一些非常不好的结果。

首先，现在的人口政策本身就是政府错误政策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这样一个政府搞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中搞了比较扭曲的价格结构，这个价格结构是什么呢？就是生活用品价格偏低，而生产资料价格偏高，这是我们在研究计划经济的时候看到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多生孩子。很简单，因为农村的农民多生一个孩子，多一份口粮。还多一块地。我劳动半天，挣工分很困难，但是我生一个孩子马上会获得很多东西。城里面老百姓也是如此，相对而言很多生活用品，包括幼儿园、学校都是非常便宜，当然这个便宜也是以短缺为代价的。

总而言之，这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扭曲的制度和政策就多生孩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样一种计划经济机制，政府主导的机制，就又生成了新的政府管制，因为管制所以管制，就像市场可以生成新的市场一样，政府管制可以生成新的政府管制。出现这种问题，

他说人口不管行吗？其实这个理由不是理由，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首先反对的是政府来对人口政策指手划脚，政府认为自己可以替代上帝去决定人口多少，我觉得这根本就是神话，应该打破。而且在政府内部是有争论的，并不是说政府内部一定一直是主张计划生育的，比如毛泽\*东也说过，他说西方是人口论，我们是人手论，这个话说的是很积极的。但是，后来为什么人口多了？和整个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有关系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可能最好的决定人口发展的机制就是自然的机制、就是市场的机制，而由政府来介入，我觉得有两点问题：第一，政府目标是单一的，影响人口的因素是综合的，人口本身也是综合的。

第二，政府介入容易产生某种断裂。其实我们今天担心的恰恰是这个断裂，就是政府突然搞了这样一个计划生育政策，又突然搞一个所谓“只生一个好”，这样持续下去会有一个指数性收缩，这个收缩在经济学来看，它根本不是到人口绝对下降的时候产生作用，它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作用，它首先带来的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市场需求的缺乏，带来萧条，这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第三，政府或者行政部门都是由人组成的，而经济学假设人就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这些人只要没有外在约束，就一定想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现在大家通过各种丑闻看到了去年的“绍阳弃儿”卖孩子事件，把人家的孩子“没收”了，向外国人卖 3000~5000 美元；也包括这次的引产事件，就是因为计生干部要罚款 4 万元，人家不给，他们就把人家孩子杀死。所以，这样的制度本身还有一个弊端，就是计生部门这些行政官员就可以利用这样所谓政策为自己牟利，而为自己牟利就不惜丧尽天良。

总体来讲，我的感觉就是最重要的人口政策就是没有人口政策，最棒的决定人口的机制就是自然的机制，它是综合的。我们看多少国家没有计划生育，他们并不比我们生的更多，或者比我们生的更少。

我再评论一下梁博士的演讲。你讲的一个观点就是人口中年轻人多一些，创新力就大一些。但是你这个研究是单项研究，如果是单项研究就有问题，那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要多生孩子，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当然创新本来是好事，毫无疑问的，肯定比没有创新的社会会带来更多的人口红利，而那些缺乏创新的社会可能人口就会消亡下去，但是从经济学上来讲，人口肯定是有最佳均衡。人口的多少是一个综合因素，而你的研究是单一因素。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创新人口比例越大，肯定人口越多越好。但是，人口多了可能在别的地方有问题，因为决定人口的不仅仅是创新，还有其他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可能人口是一个均衡的东西，更应该追求的是一种均衡。你的结论是“越什么越什么”，经济学不这样想，经济学上讲的就是一定有均衡，好的东西过多了，负面的东西也就多了，两个相冲抵就达到均衡。这是我的感觉。谢谢！ 🍷

[【返回目录】](#)

## 禅心云起：如何走出“低生育率陷阱”？——人口生育的经济学

[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

### 谁“又蠢”、“又坏”？

最近有学者呼吁采取措施提高生育率，其中有一项政策建议是：

1.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为了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建议设立具有强制性和保障性的**生育基金**制度，鼓励家庭生育。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

这个建议立即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痛斥，在一个多生还要罚交“社会抚养费”的国度里，人们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我们把这个政策建议稍微改头换面一下。不再只是强制个人自掏腰包，而是国家和个人一起负担、(比如)按50%比例共同分摊。情况会怎么样呢？反对声浪会立即减弱一半。

或者，我们再把政策建议修正成，基金完全由国家负担，个人不掏一分钱，换言之，国家无偿对二孩及以上家庭进行大力补贴，甚至主动承担大部分抚养费用。情况会怎么样呢？不用说什么了，开始鼓掌吧。

但是，且慢。

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会立即站出来指出，这完全是一个类似于“朝三暮四”的戏猴游戏。国家补贴来自哪里呢？国家本身不事生产，它的任何补贴只能来自于每个人缴纳的税收啊。那么第三种和第一种方式之间到底区别有多大呢？在头一种方式下，你被迫为自己不想要的生育掏钱；在第三种方式下，你被迫为别人的生育掏钱。

为第三种还有其他荒谬政策建议鼓吹的，包括时下风头正劲、充满正义能量的马光远。那么，顶着“经济学家”头衔的此君加给别人的“又蠢”、“又坏”的贬斥，为什么不也应该反弹到自己身上？

### 什么阻碍了生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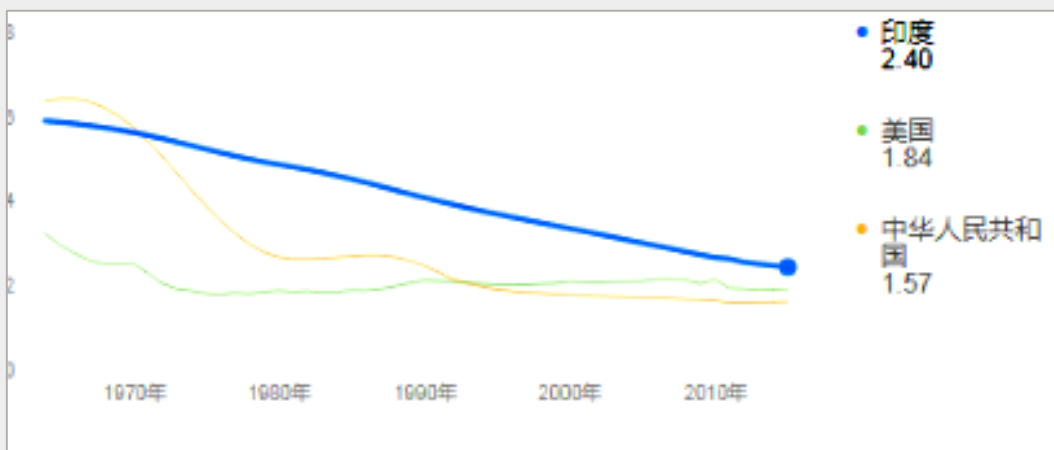
从第一种到第三种药方，都打着增加人口出生率的旗号。但为什么我们要增加人口出生率呢？据说现在生育率水平太低了，以下是《新浪财经》今年8月2日科普的内容及数据：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也不减，理论上一对夫妇只需生2个孩子。但是由于部分小孩会夭折，且正常出生性别比不对称（以女孩为100，正常出生性别比为102-106左右），因此总和生育率应该高于2.0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以发达国家为例，每出生205个孩子中有105个男孩、100个女孩；约2%的人在育龄前死亡，那么活下来的98个女孩每人需要生2.09个孩子才能使得总孩子数为205个。因此发达国家通常说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当是2.1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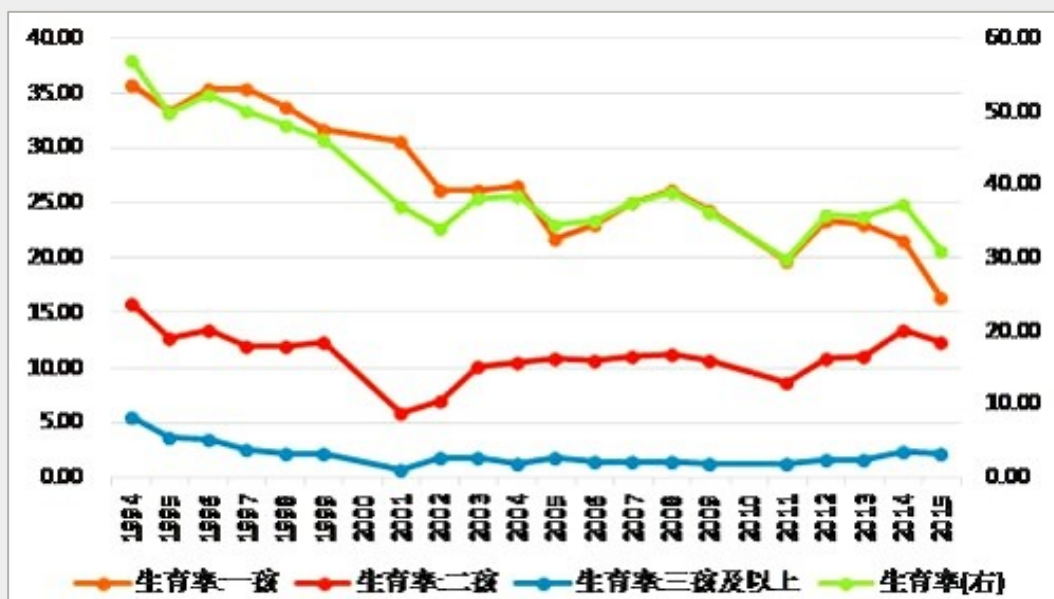
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0岁性别比高达116.12，也就是每出生216个孩子只有100个女孩；该年女婴死亡率为2.42‰，差不多有4%的女孩在育龄前死亡，那么剩下的96个妇女需要每人生2.25个孩子才能让孩子总数达216个，即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接近2.25。

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0左右，处于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文章中没有科普的是：不仅我国生育率低，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生育率低的困境，甚至连印度生育率也在大幅降低。



各国至 2015 年生育率走势 数据来源：维基百科



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交银金研中心

生育率一旦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规模就会随着世代更替而萎缩，然而，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的财税、社会及福利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成长才能维持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维持人口增长是扩大税源、实现财政收支可持续的需要，否则的话，日益减少的劳动力将无法支持日益老龄化的人口。这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

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阻碍各国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有哪些呢？过去存在着不少归因错误的荒谬学说，比如说一个社会越富人们越不想生。实际，人口增长取决于个人生养孩子的意愿及能力（尤其在节育技术发达的当代社会），这注定包含他对孩子收益成本的经济计算。

**一是儿童的社会化政策。**现在大部分国家，由于受欧美进步主义（俗称的“白左”）政策的影响，孩子必须接受长期的国家义务教育及非职业化（非传统学徒制）教育，且没有工作权，造成他们直到大学毕业后，都不会有多少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劳动赚钱技能。这摧毁了传统伦理中孩子作为父母工作帮手和减轻家庭负担的价值，从而把生养孩子在很漫长的时期内，几乎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奢侈消费，且成本越来越高。（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化政策，由于现代社会工作更轻松效率更高，富裕社会孩子的生产力将大幅高于贫困社会孩子的生产力，人们会愿意维持多生。）

**二是高税收实现转移支付的福利政策。**一方面，国有资助的养老机制，弱化了孩子在自己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的伦理义务（即自家老人自家养），导致潜在的孩子对于父母长期来说更没有价值。另一方面，高税收造成了个人投资和消费能力不足。除了个人所得税，还包括工薪税这种养老金的代际支付机制，当代年轻人实际承担着上代退休老人的养老开支（即别家老人也要你帮着养），这导致年轻人负担过重，生养孩子意愿进一步减弱。如果把通胀税考虑进去，情况就更加严重。

**三是人口就业岗位不足。**对企业任何管制和税收政策，都会影响到就业岗位的增加。当企业负担沉重到一定水平，社会中就会缺少容纳足够多新劳动人口的就业岗位，从而使孩子的投资价值进一步降低。因为这代表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会有一段时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也有非职业化教育导致工作经验不足的因素），意味着即使你的孩子工作后，你还必须为他们继续贴钱。这样的年轻人，在中国叫“啃老族”，在美国叫作“彼得潘一代”。

当然，个人其他任何消费和投资考虑，都会和生养孩子的欲望展开竞争，但这些因素，往往是维持体面生活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强行打断这些因素，对生育的负面作用都会压过正面作用。即使像罗马尼亚过去那样，国家违背个人意愿，动用各种手段强制把孩子生下来，也会造成孩子养不起的窘境，结局是孤儿院挤爆，儿童受虐待且成为财政负担。物质匮乏及情感缺失环境下长大的一代孤儿，至今仍然是困扰该国的严重社会问题。

### **这些政策能实现目的吗？**

那么最近各种“专家”提出的政策，是否可以实现增加生养孩子意愿及能力的这个目的呢？

**一、强制生育储蓄。**强制显然违背个人生或不生的意愿，且从根本上没有提高生养能力，而且强制储蓄基金还可能受到通货膨胀的侵蚀。

**二、收税来补贴生育。**无论具体采取什么的转移支付形式，姑且不计中间的行政成本和浪费，向一部分人收税，去补贴别一部分人，在最好情况下，对于生育意愿和能力的作用也是互相抵消的。实际上在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推动了人口结构转变，即不愿从事劳动生产者多生，愿从事劳动生产者少生，结局是走向“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倒金字塔”结构（即太多人享受福利，太少人创造收入），从长期摧毁一国财政。

**三、立法延长产假和提高妇女工作待遇等。**这只会提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用工成本，造成妇女更难以找到工作，家庭经济收入普遍下降。

其他还有什么按生育人口分配住房指标等等奇葩主张，就不一一分析。这里基本上有一个规律：但凡充满了计划经济干预色彩的刺激生育措施，都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

### **正确的人口理论和政策**

应该是什么样？

低生育率已成为这个时代困扰许多国家的重大难题。

但为什么我国过去要用强制手段控制生育呢？和接受了西方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有关。这个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有其极限，而人口增长没有极限，所以不控制人口增长，就会造成资源枯竭，最终是世界末日。

马尔萨斯的人口观，在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反倒是成立的。因为这种经济根本不会有什么像样的增长，物资财富少得可怜，在有限存量中只能采用配给制，“过多”或增长过快的人口，确实往往容易成为一种“负担”。

八十年代，我国刚逐步摆脱计划经济，人多是负担的印象仍然根深蒂固，加上现代马尔萨斯理论60-8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的盛行，控制生育政策于是在内外多方力量的推动下被提上了日程。

然而，在市场经济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张的今天，大家渐渐意识到：人多的地方生意就是好做。这和市场经济是分工合作经济有关，一个地域人口越多，只要不受计划干预政策阻碍，劳动和知识分工细化的程度也就越高，人际之间的交易和合作以指数级增长，社会富裕起来的速度也就越快。原来在计划经济下当负担受轻贱的人口，在市场经济中被称为“人力资本”，被认为具有“企业家才能”，本身成了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引进，更使不少人开始意识到，和知识相关的经济资源本身是可以被无限创造出来的，经济的增长可以是没有极限的。

著名经济学家德索托指出：“企业家过程产生一种连续的社会‘大爆炸’，它使得知识的无限增长成为可能。”他还引用了数学家与物理学家提普勒的观点，“地球上知识扩张的极限是10的64次方比

特，这在数学上表明，人类的文明所处的是一个可以无限地扩张其知识、财富和人口的空间。”

如此看来，关注重点应该转移到：如何实现这种知识、财富和人口的无限扩张？

首先要明确，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再多人口也是于事无补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增长停滞时财富要分给更多人，反而意味着社会更加贫穷和动荡。

我们大致可以推出，知识、财富和人口无限扩张的前提，一定是更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现有情况下，当然是推动更市场导向的改革，除了**彻底把生育权交还给民众**以外，这里仅简略提三个重要方面：

**一、低税政策和福利制度改革。**以低税（而不只是低税率）促进个人收入增长、就业岗位增多，这样人们不仅消费能力增强，也有余力长远筹划，提高储蓄投资意愿，这既让生养孩子在当前变得可以负担，放长眼光看，也成为给父母带来巨大回报的投资。此外，真正的低税，当然也意味着较低的转移支付，这无疑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缩减财政开支及降低财政供养人口。

**二、教育改革，反思一个“模子”的义务教育，让多元化、职业化和市场化成为新导向。**在教育方面的创新将有助于激活人口存量，使年轻人更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有了期待中更能创造财富的年轻一代，潜在的父母才会更有生养的意愿。

**三、消除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无疑是带来房价上涨和生活成本提高的重要推手，是抑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摆脱通胀需要金融领域朝着健全货币体系的更大胆变革。 🍷

[【返回目录】](#)

## 易富贤：不要将人口高利贷当红利

[ **易富贤**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论坛网络专家，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母胎医学奖学金项目”研究员，本文摘自作者 2010 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 409 期学术论坛的主题报告，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本文作者**易富贤**

地理上，我来自湖南湘西。这是个非常偏僻贫穷的地方，怀化的名字来源于宋朝的怀柔归化。学科上，我是医学专业，不属于社会学，也不属于经济学。今天，我以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专家指导。茅老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莫把人口欠债当成人口红利》，我今天讲的题目和茅老师的观点很一致。茅老师认为，独生子女政策产生了人口红利，但这种人口红利并不持久，会导致人口欠债。我认为，茅老师的预测非常准确，和我的看法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我今天主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人口高利贷。

中国于 1980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当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展开。当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因为，按照 1979 年的生育率计算，中国人口将会增加到 40 亿，而最适合中国的人口应该是 7 亿。中国贫穷、资源短缺是因为人口太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行一胎化政策。当时预测，一胎化政策会产生人口红利，可以缓解就业压力，不用担心劳动力短缺，并且能够提高人均 GDP，不用担心老龄化，不会出现性别比失衡，还能缓解资源短缺。由于这些好处，当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但实际的实行结果让大家始料不及。当时预计不会出现的性别比失衡，其实两三年后就出现了。1995 年，性别比就已经高达 120，今后 30% 的男人可能要打光棍。另外，当时认为老龄化最快也要在 2020 年之后，但其实提前到了 1999 年。当年预测能够做到老有所养，但现在

已经出现了养老金短缺的问题。当年还预言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但 2004 年就已经出现了用工荒。可见，当年的预测是有偏差的。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不要将人口高利贷当红利。1980 年实施计划生育的一个初衷是提高生活水平，获得人口红利。当年认为人口增长过快，资金的积累就会减少，人口增长减慢，资金的积累就会增加。人口增长过快，生活水平很难提高，这是当年实施计划生育的理由。按照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的观点，人口红利的含义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和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当前我国人口红利对 GDP 的贡献大概是 27%，每上升 1 个百分点，我国的人均 GDP 上升 0.16 个百分点，反之也相同。这个观点与 1980 年的观点基本一致 .....

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叫做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包括儿童和老人，儿童是指 0-14 岁的人群，老人是指 65 岁及以上的人群。劳动年龄的人口一般在 15 岁到 64 岁之间。所以，总抚养比也分老年抚养比和儿童抚养比，前者是老人与劳动人口的比值，后者是儿童与劳动人口的比值。因为儿童是国家的希望，我认为儿童抚养比高倒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反而是一项投资。但老年抚养比就相当于还贷了。儿童抚养比下降必然会导致今后老年抚养比急剧升高，这就是人口高利贷。

以韩国为例，我们看一下生育率、总抚养比、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之间的关系。韩国在 60 年代平均生育率是 6.0 左右，和中国一样，平均每个妇女生 6 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因为孩子减少，儿童抚养比降低。从生育率下降到儿童抚养比下降有 5 年的滞后期。儿童抚养比下降也必然引起总抚养比下降。国际社会把韩国的经济模式作为少生快富的典范进行宣传。韩国目前仍然在享受人口红利，经济还不错。老年抚养比不高，大概 6-7 个劳动力抚养 1 个老年人。韩国的总抚养比不到 40%，所以还是比较轻松的。但这种情况并不持久，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未来，情况就很不一样了，韩国人就要开始还贷了。2015 年之后，由于老年抚养比快速升高，总抚养比也快速升高。现在，韩国是 7 个劳动力抚养 1 个老人，三十年后的 2040 年，老年抚养比达到 50%，也就是 2 个劳动力抚养 1 个老人，韩国就面临很大威胁。所以有人说，韩国如果照现在这样继续下去，20 年内就会崩溃，这就是人口高利贷的问题。可见，降低生育率就会降低儿童抚养比，必然造成日后劳动力不足，老年抚养比增加。这是以韩国为例，说明人口红利和高利贷的关系。

中国很多学者把抚养比下降当成一件好事，因为人过得轻松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总抚养比太低意味着儿童太少，儿童决定着消费者数量，消费者数量不够必然导致消费萎缩，消费萎缩必然导致就业压力。总抚养比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有个度。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该在 50%到 60%之间。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在战后缓慢下降，儿童抚养比缓慢下降，总抚养比也缓慢下降，但 50 年代到 80 年代间一直都维持在 50%到 60%之间。现在，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还是在 50%左右，其中美国的总抚养比从来没有低于过 50%。



计划生育于 1982 年 12 月写入宪法后由各地计生委实施，  
三十年来全国各地雷人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层出不穷，惨烈的强制堕胎悲剧  
在中国大地随时随地发生着，计生人员抓住一个孕妇即可获 500 到 800 元奖金，  
庞大的计生食物链助推了腐败丛生，  
这一疯狂的群体被愤怒的民众称为“祸国殃民寄生尾”

老年人和儿童对经济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在 40 年代，平均每个妇女也是生四五个孩子。但到了 50 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起步，生育率是急剧下降的。50 年代，已经下降到平均每个妇女生 2.2 个孩子。经过一段滞后期后，儿童抚养比也开始下降。60 年代中期，日本的抚养比开始低于 50%。如果有远见，当时就应该采取措施，防止生育率继续下滑，但日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的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日本的模式，认为其人口下降快，经济发展好。可 90 年代后，日本老年抚养比快速升高，总抚养比也快速升高。日本经济在 90 年代后跌入谷底，人们常把其归咎于银行等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口结构问题。日本在 50 年代，总抚养比在 55% 左右，现在，日本的总抚养比也是 55% 左右。如果抚养比对经济的作用是一样的话，那现在跟 50 年代应该差不多。但 50 年代，日本的经济朝气蓬勃，而现在日本的经济是一蹶不振。为什么？因为 50 年代，55% 的总抚养比以儿童抚养比为主，或者说以投资为主；而现在，虽然也是 55%，但以老年抚养比为主。儿童作为消费者，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创造的就业机会比老年人多。儿童带动的是玩具、教育等一系列产业，产业链很长，而老年人带动的产业链比较短。所以，同样都是消费者，儿童对产业的贡献大一些。

以上是日本的情况，中国在 60 年代以前，平均每个妇女生 6 个孩子。1971 年，中国开始控制人口，提倡生两三个孩子，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5 年滞后期后，儿童抚养比快速下降，总抚养比也下降。刚好 1979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就是因为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经济学家也认为这是人口红利。但是，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到 2015 年就开始快速上升，而现在，中国的老年抚养比是 11% 左右，也就是 9 个劳动力抚养 1 个老年人。中国目前有 4000 万城市老年人享受社保，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老人的退休金经常比刚参加工作的人还

高。于是出现了啃老现象，子女的工资不够，要靠父母的退休金养活自己。到 2050 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将达到 50%，也就是说，2 个劳动力抚养 1 个老人。中国的问题在于，目前的总抚养比低于 40%，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生育率下降得越快，今后老年抚养比反弹的速度也越大。所以，2050 年之后的情况可能更加危险。而且，因为就业压力和消费不足等问题，我们并没有享受到人口红利。这就等于虽然借了钱，但没有消费。

印度的人口红利比中国好得多。印度在 60 年代和中国、韩国一样，平均每个妇女生 6 个孩子，但印度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或者说 70 年代实行过一两年，但很快被投票、选举选下来了。印度的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本身带来的，所以下降得比较缓慢，儿童抚养比下降得比较缓慢，老人抚养比上升得也比较缓慢。印度目前比中国差并不是因为没有实行计划生育，而是因为经济改革比中国落后十几年。中国 1979 年改革开放，印度 1991 年实行改革。2050 年，印度的老年抚养比是 20%，相比之下，中国是 50%，印度的情况明显比中国要好。所以，虽然现在印度比中国落后，但长远地看，从人口结构来说，印度比中国前景更好。

中国 1971 年开始计划生育，到 70 年代后期，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假如中国在 1980 年停止计划生育，那会怎么样？生育率还是会下降，因为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下降。当年中国生育率是 2.6、2.7 左右，假如用 10 年时间缓慢下降到 2.1、2.2 左右，也就是世代更替水平，然后鼓励生育，防止生育力继续下降，儿童抚养比到 90 年代下降就会比较缓慢，总抚养比的下降也会比较缓慢，到时老年抚养比也就是 30%左右，比现在好多了。当时，中国不但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反而要格外小心，90 年代应该要鼓励生育。但中国在 80 年代应该停止计划生育的时候，反而实行了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

美国可以算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好的，美国妇女平均生 2.1 个孩子，保持了世代更替水平。70 年代，美国生育率在 1.8 左右，80 年代里根时期出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有所变化，90 年代生育率升至 2.1 左右的世代更替水平。因此，美国的总抚养比和儿童抚养比也下降比较缓慢。美国的购买力原来和欧洲差不多，但现在比欧洲多 30%。

计划生育当年是陈慕华提出的。1978 年，她作为副总理，就提出了一胎化。她的幕后是陈云。他们提出计划生育的理由是，减少人口能够缓解就业压力。田雪原 1981 年也从就业角度提出，中国的适度人口是 6.5 到 7 亿。中央党校的王东京、程恩富、何清涟也认为中国就业压力大，需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此我并不认同，生产和消费是比例的关系。房子之所以称为房子，是因为里面有空间，如果都是墙，就不称为房子了。可以说，墙壁是生产，房间是消费。不能只有生产，没有消费，有需要通过无来实现。有是墙壁，无是房间。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生产为消费服务是世界强国发展的客观规律。

消费的增长标志民生改善和市场活跃，而这两个因素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世界

正进入消费产品剩余化、多样化的时代，现在缺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发言权要大于生产者。所以，人口减少并不能够缓解就业压力。



据人民网（2010年3月1日电 记者常红）《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指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本高昂，机构重复设置导致财政资源浪费极为严重，庞大的执行体系使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成为财政投入最多的部门之一，截至2005年底统计，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此外，全国还有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干部1142万人，兼职干部5727万人，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李宏规在《中国计划生育领导管理机构的历史变化》一文中，列出20多个部委均对计划生育政策负有责任

就业机会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有人口才有消费，有消费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产，有生产才有就业，有就业才能养孩子，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计划生育把人口砍掉，就导致就业和生产比例失衡，因为就业更多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比如，穷人买衣服，可以提供一个低工资裁缝的就业机会，而富人买衣服，也只能提供一个收入比较高的就业机会，他们不能每天穿很多便宜的衣服。

“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与“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荒谬。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试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还不理解“两个铁球”的原理。比如，日本目前的人口是1.27亿，可提供0.66亿个就业机会，也就是总人口的50%左右。而印度目前有1.17亿人口，可提供4.7亿个就业机会，也接近总人口的50%。如果说中国人口少，就业压力就小，那巴西人口少面积大，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2006年，巴西的失业率却高达9.6%，而美国只有4.8%。巴西人口少，失业率反而高一些。所以，中国减少人口不一定能缓解就业压力，这是消费人口和总人口比的问题。我选择了全世界人口上500万的国家，

以 15-64 岁的为生产者，以总人口为消费者，结果发现大多数地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都低于 50% 或在其左右，而中国这个比例却高达 63.5%。中国目前有 8 亿劳动者和 13 亿消费者，如果中国的劳动者和消费者比例也是 50% 左右，那么 13 亿消费者只能提供 6.5 亿个就业机会，出现了 1.5 亿的劳动力剩余。中国内需不足不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够，更主要的是消费者数量不够。

以前，农民要努力干活才能满足大家对食物的需求。而农业机械化以后，很多农民失业了，工厂也不那么缺人，那大家就去第三产业。发达国家中，第一产业一般占 5% 以下，第二产业占 25%-28%，第三产业占 70% 左右。可见，失业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改变，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目前发达国家从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只占 30% 左右，假如没有第三产业，70% 的人就会失业。如果把人口总数减一半，失业的比例还是 70%。这是比例的问题，而不是绝对量的问题。我认为，计划生育反而增加了就业压力。首先，它减少了孩子的数量，孩子数量的减少带来了消费者数量的减少。另外，美国、日本、印度等很多国家的妇女因为生孩子都留在家里，而中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 86%，世界罕见。这两方面原因导致了失业率的提高。假如 1980 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一是消费者增加，就业容量大大提高，二是只有 1980 年代初出生的大约 3 千多万进入劳动市场，相对于 8 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而且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所以，结果会比现在要好。



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也与此有关。第一，全国内需不足，导致就业萎缩。第二，大学盲目扩招。扩招是应该的，但扩招的专业结构与中国的国情脱节，导致培养的人才不符合中国的需求。从 1999 年的 108 万到 2009 年的 629 万，这种扩招放到任何国家都会产生就业压力。第三，就业制度也不利于企业聘用毕业生。第四，独生子女娇生惯养，不愿意做工资低的工作。另外，计划生育也延迟了产业升级。该政策导致中国的劳动力过剩 1.5 亿，面对大量劳动力，企业都压低工资。而低工资不利于产业升级，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低工资也无法负担工人的家庭开销，于是出现了中国独有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现象。加上生产和消费不在一个地方，前者在城市，后者在农村，于是，农村的城市化水

平就不能提高。如果工资够，打工者能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城市化比例就能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8%增加到2008年的45%，年均增长只有0.9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城市化像韩、日在经济起飞期间那样年均提高1.52和1.94个百分点的话，那么2008年中国城市化应该为63.5%、76.1%。所以，计划生育延迟了产业升级、阻止了城市化进程至少10年以上……

今年揭开了劳动力全面短缺的序幕。1980年的预测说，不必担心劳动力短缺：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问题：例如劳动力不足。到二十一世纪初，每年还会增加一千多万个劳动力。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因此，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2004年就出现了劳动力短缺，2010年又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但现在的用工荒与2004年的有本质不同。2004年主要是20-39岁年龄段的劳动力短缺，而19-22岁的人口是增加的，20-30岁和15-64岁的劳动力都是增加的。所以，2004年只是结构短缺，而不是全面短缺。但2010年，20-39岁的人口快速减少，19-22岁的也急剧减少，20-30岁的2011年后会快速减少，15-64岁的总劳动人口从2012年开始也会急剧减少。



人口老化已成了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隐患，又老又穷将成现实 图片来源：VCG

以上是15-64岁总人口和20-39岁年轻人口的图，数据来源于客观调查和统计年鉴。现在很多人说，中国总劳动力还过剩，所以计划生育不能停。其实，总劳动力过剩有滞后的问题。即便2010年后一个孩子都不生，到2034年，15-64岁总劳动力仍超过7.0亿。因为，人的寿命平均有70多岁，但那时将没有24岁以下人口了。所以，不能因为总人口过剩而阻碍政策的调整。

从人口结构看学校破产。从图上可以看出，对于7-12岁的小学生，1996、1997年人数开始减少，很多学校已经破产了；对于16-18岁的高中生，人数也在减少，很多高中现在都合并了。如果大学还相信国家计生委“修正”过的1.8的生育率而盲目扩招，今后将会有大批高校破产。

社会对 19-22 岁人口数量变化最为敏感。企业最需要这个年龄段的人，因为他们最有活力。2009 年，这群人开始减少，企业出现用工荒问题。大学也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大量高校将破产。去年，高考报考人数已经下降 40 万，今年又减少 70 多万。对国防来说，这正好是参军入伍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下降必然导致国防能力下降。目前我们只要求 10% 的男生入伍，今后可能要提高到 19% 才能保证兵源。而对房地产来说，再过几年，等这群人到了要买房子的时候，房地产市场也会开始萎缩。从 2009 年到 2018 年 9 年时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将从 1 亿下降到 5000 万，下降一半左右。这是非常危险的。 .....

蔡昉认为计划生育减少了年轻劳动力，导致现在民工荒，出现刘易斯拐点，此后会出现工资上涨，进而推动产业升级。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我比较了全世界所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个拐点。我认为刘易斯拐点是错误的，只有理论价值，没有实证价值。

蔡昉认为，日本在 1960 年代出现所谓刘易斯转折的时候。但当时，不但 15-64 岁总劳动力在不断增加，而且 20-39 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加，并没有出现拐点。1995 年，日本总劳动力开始下降，经济也开始下降。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比日本落后 40 多年，日本的总劳动力在 1995 年左右开始下降，中国在 2002 年开始下降，晚了不到 10 年。韩国也没有出现这个拐点。目前中国的发展水平相当于韩国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水平，但当时韩国 20-39 岁和 15-64 岁的劳动力都是升高的。直到 1995 年左右，韩国 20-39 岁劳动力才开始下降，而其总劳动力要到 2015 年才下降，比中国还要晚。韩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早，但劳动力下降比中国晚，可见，韩国的经济模式和中国的不同。所以，不能因为日韩的发展情况而认为劳动力短缺是个好事，其实不是的。台湾也没有出现拐点。台湾的经济发展比大陆早 20 多年，但其 20-39 岁劳动力下降的时间比中国晚，15-64 岁总劳动力下降的时间也在 2015 年，比大陆晚。韩国和台湾目前的生育率是 1.1，已经很危险了，但因为总劳动力在增加，所以经济仍然很有活力。但是，日后随着劳动力的下降，韩国、台湾也会出现问题。

西欧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早近百年，但其 20-39 岁劳动力到 1995 年后才减少，只比中国早 7 年。而 15-64 岁总劳动力到 2010 年后才减少，几乎与中国同步。也就是说，西欧社会发展比中国早近百年，但劳动力下降几乎与中国同步。可见，在各国的快速发展中，都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所以，中国的拐点是个经济衰退的拐点，而不是经济转型的拐点。将所有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 20-39 岁劳动力也是 1995 年之后才开始减少，15-64 岁总劳动力也到 2010 年之后才开始减少。其他发达国家的年轻劳动力都会在 1995 年减少，但是美国不一样。因为美国 80 年代生育率不断提高，其年轻劳动力会增加到 2030 年才减少。美国比其他发达国家发展好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劳动力比例比日本和欧洲好。中国比美国落后 90 多年，比如，中国 2009 年城市化只有 46.6%，而美国 1920 年就超过了 51%。但美国 20-39 岁、15-64 岁劳动力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将分别增加到 2030 年、2035 年，但中国就已经开始减少了。

HDI 是联合国使用的发展指数。2007 年,拉美-加勒比海地区的 HDI 为 0.821,高于中国的 0.772,说明拉美-加勒比海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但是该地区的劳动力并没有减少。东南亚国家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接近,但其劳动力也要等到 2030 年才开始减少,比中国晚 25 年。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20-39 岁的黄金劳动人口要增加到 2035 年,总劳动力要增加到 2045 年,都比中国要晚。2009 年,中国在联合国 182 个国家中排 92 名,处于中游。2007 年的 HDI,中国为 0.772,全球为 0.753,中国也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从劳动力角度看,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20-39 岁劳动力要增长到 2030 年(中国为 2002 年),15-64 岁总劳动力要增长到 2035 年(中国为 2012 年)。可见,中国劳动力减少比其他国家更快。

印度目前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但印度劳动力减少时间比中国晚 30 年。所以,印度的潜力比中国大。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20-39 岁的劳动力有 2.8 亿,印度经济起步时是 2.6 亿,数量相差不多。到 1990 年,中国的劳动力比印度多 1.37 亿,到 1995 年,差距拉大到 1.41 亿,但 2014 年,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数量就一样了,而 2025 年,印度的劳动力将比中国多 1.35 亿。中国劳动力多的时候,吸引外资的能力远远超过印度。当中国劳动力少于印度的时候,很多企业将会转移到印度。印度经济从 2003 年以来保持了 8% 高增长率。“高盛全球研究”预测,2020 年前印度将保持 8% 以上的增长率,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到 2050 年则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综上所述,中国是唯一一个国未富,民已荒的国家。我们和日本 60 年代,韩国 80 年代,拉美 90 年代,东南亚现在的水平差不多,但这些国家 20-39 岁和 15-64 岁的人口都在增加,只有中国已经开始减少。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劳动力减少时间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步。中国劳动力短缺会导致劳动优势降低,很多企业就会转移到印度等国家,而印度劳动力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会提高。同时,发达国家 2015 年后消费会萎缩,进口也会减少。这两个原因会导致中国的经济越来越依靠内需。计划生育减少了消费者,导致总劳动力过剩,表现为就业难,而年轻劳动力短缺,表现为用工荒。中国经济未来的特点就是用工荒和就业难长期并存。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年轻人能胜任的工作,老年人并不一定能胜任。就像计划生育引起性别比失衡一样,今后一方面出现“女人不足”,或者说光棍问题;另一方面,又出现“女人过剩”,因为女人长寿,计划生育将使得大量女人老无所养。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茅老师认为,应该及早回到一个正常的人口状态,即没有人口红利也没有人口负债的状态,也就是妇女的生育率大体上保持可持续的状态。这种常态是什么状态呢?我认为,正常的社会是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为到达时代更替的状态,发达国家平均要生 2.1 个,中国要生 2.3 个,发展中国家要生 2.5-3.3 个。由于 15% 左右不孕以及丁克家庭的存在,虽然平均是 2 点多个孩子,但主流家庭应该生 3 个,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假如主流家庭不让生、不愿生、养不起三个孩子,那这个国家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之所以发达国家平均生 2.1 个,中国平均生 2.3 个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普遍在 3-5‰,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普遍在 5‰ 左右,

出生性别比为正常的 105 左右。但中国不一样，2000 年，婴儿死亡率为 32‰，几乎是发达国家爱的 10 倍，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40‰，也几乎是发达国家的 10 倍，而且，中国儿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也都远高于发达国家，特别的，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超过 120。所以，中国的时代更替水平不能采用 2.1，而要在 2.3 以上。

如果中国达到时代更替水平，那会是什么样呢？我比较了人口在 500 万以上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和生育率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如上图所示，人类发展指数越高，总生育率越低，也就是说人们越不愿意生孩子。可见，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会自发下降，中国应尽快停止计划生育。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已经低于 2.3 了，所以，我们反而要鼓励生育。新加坡、韩国 1988 年的 HDI 为 0.8，生育率分别只有 1.62、1.56，低于 2.1。2009 年中国的 HDI 达 0.8，根据各国经验，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现在泰国、伊朗、巴西的 HDI 与中国的非常接近，生育率分别只有 1.64、1.4、1.9。根据这些国家的数据看，中国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应该也只有 1.6 左右。《2006 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每个妇女只愿意生 1.73 个孩子。所以，从生育意愿和经济发展水平两方面看，即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很难达到时代更替的水平了，可见停止计划生育已经晚了。

停止计划生育其实是一举多得：可以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可以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可以弥补今后的劳动力短缺，可以缓解今后的光棍问题，还可以使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婴童经济。婴童经济可以带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比如吃喝、教育、玩具等，对内需的拉动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并且是可持续的，是扩大内需的超级增长点。所以，中国应该停止计划生育，通过改革分配制度，让老人多养些孩子。

感谢茅老师对我的支持。2004 年，我当时联系的众多贤达中，只有茅老师表示支持。我多次就粮食、经济学等方面请教茅老师。2006 年，计生委报复我家人，也是茅老师积极给予支持。茅老师还多次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为我的《大国空巢》作序。去年，茅老以为我能申请基金，后得知我是自费并动员亲友捐款数万后，茅老表示他个人愿意资助我，我对此表示感激。最后，谢谢大家！ 🍷

[【返回目录】](#)

## 茅于軾：人口红利，人口高利贷

[茅于軾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本文摘自作者 2010 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 409 期“双周论坛”的发言，中评网首发]



本文作者、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

今天请易博士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天则所作为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如果看到政策有问题而不发出提议的话，那将是很遗憾的。在我看来，计划生育政策是有问题的。在国内，反对计划生育的声音很难发出来，并且计生委通过温总理表达了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变的态度。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集思广益，形成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

我觉得蔡昉提的人口革命非常对，因为计划生育，我们的人口负担比较轻，储蓄率非常高，增长的原因就是红利。因此，从经济学出发，我赞成计划生育。但后来慢慢的，政策就有点不对头了。家里小孩少了，劳动力就不足了。以劳动力人口为分母，非劳动力人口为分子，中国这个比例的变化非常惊人，在改革开放的 30 年中，从 70%多降到了 30%多。其他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变的。至于人口密度高低和经济的关系，是说不清的。人口密度高的国家有穷的也有富的，穷的就是孟加拉，富的就是日本。人口密度低的国家也是有穷有富。所以，人口密度和经济没有直接的关系。

目前国内很多人只知道人口红利，不知道人口高利贷。中国计划性最强的两个部门，一个是教育部，一个是计生委。教育部的权利没有计生委大，计生委可以罚钱，可以罢官，这个权力大得吓人，这也正是现在的问题关键的所在。如果取消了计划生育，计生委的人不但没有权利罚款、罢官，连饭碗都没了。我的建议是，把计生委改成优生委。我们要给计生委的人想条生路，不然，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就是难上加难。

计划生育还是基本人权的问题，我反对计划生育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做了很多侵犯人权的事情，造成了很不好的国际影响。其实，计生委内部对计划生育也有不同的看法。下一步的研究，一方面要继续深入考察计划生育的前景和后果，另一方面也要好好考虑计生委人员的出路。



计生委反对停止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一旦停止，人口就要爆炸。今天，易博士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取消计划生育不会导致人口爆炸。另一个是人口结构问题，特别是性别比结构失衡，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易富贤：**

后年开始，中国就会出现光棍问题。丈夫一般比妻子都大两岁，现在，适婚男性似乎比女性还少一点，但后年也就是 2012 年之后，男女比就大幅上升。

**评议人：**

这也存在区域不平衡，有的地区比较平衡，有的地区就特别不平衡。

**茅于軾：**

性别比失调是不是和计划生育有关？易博士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性别比在计划生育以前是正常的，因为大家可以无限制地生。可见，性别比失调和计划生育是直接相关的。

**评议人：**

中国的性别比失调最严重，而且跨越时期最长。所谓儒家圈，像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都在出生率下降的时候伴随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都是短期的，没有我们这么严重。

**茅于軾：**

现在世界上没有过剩的女孩，只有过剩的男孩。另外，中国的人口高峰在什么时候？ 2020 年。

**易富贤：**

联合国预测认为中国人口不会超过 17 亿，美国也认为中国人口不会超过 17 亿。

**茅于軾：**

有人认为，中国实际上没有 13 亿人口，但大部分人认为比 13 亿多。

**易富贤：**

当时按照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只有 12.4 亿，但有人认为有漏报，所以加上 2000 万，成为 12.658 亿。现在每年人口应该只增加 400 万，10 年就是 4000 万，按照普查数字，2010 年的总人口应该低于 12.8 亿。计生委预测今年人口可能达到 13.6 亿，但我认为，可能 12.8 亿都达不到。

**李建新：**

这个数字不是计生委在说话，是国家统计局权威发布的。所以把 12.4 调成 12.6 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考虑到了漏报的可能。中国现在处于急剧转型的时期，城乡流动人口给普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个是漏报，一个是重报，漏报大于重报，所以数据往上调了，这不是计生委决定的。不过，计生委说现在及今后每年人口净增 800 到 1000 万那是胡扯。因为统计局不像计生委那样有立场，所以普查的资料可能更准确。另外，因为数据是连续性的，所以有互检验性。比如，1990 年普查的 0-9 岁人口 2000 年普查时就 10-19 岁了，但是，2000 年 10-19 岁的人口反倒比 1990 年 0-9 岁的人多了，这就说明 1990 年有漏报，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下超生是要罚款的。若干年后，该上学时父母又开始给孩子报户口，但那时的惩罚力度就已经小了。基于这样的事实，漏报是有根据的。

.....

**易富贤：**

人口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其实从道德层面说，计划生育不能实行，但中国不讲这一点，中国只能进行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茅老师宝贵的一点就是，他提出了计划生育侵犯人权和道德底线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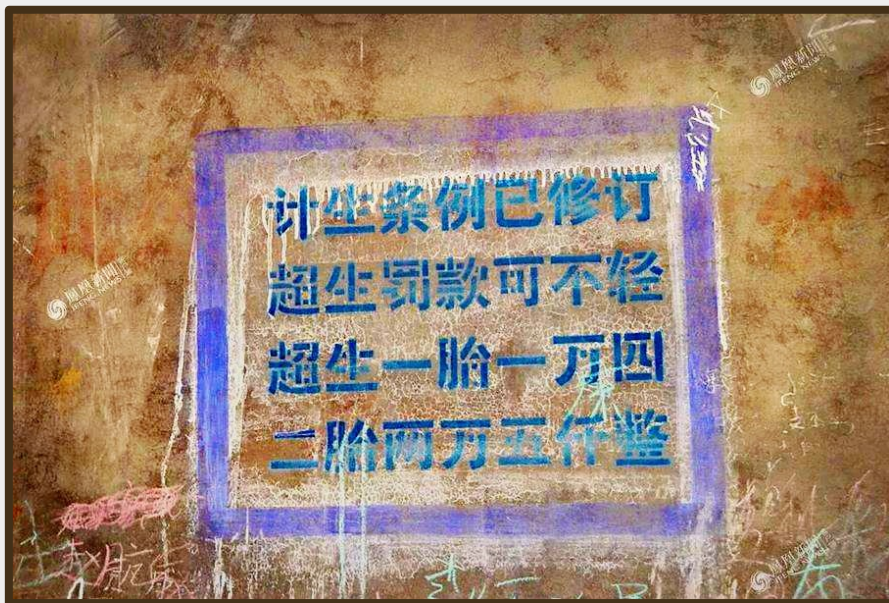
..... ❸

[【返回目录】](#)

## 袁森：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 年规模或超 200 亿，去向成谜

[袁森 中国经营网编辑。本文首发于 2012 年 5 月 2 日中国经营网, 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 转载请注明]

近年来, “社会抚养费” 这个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利器” 也逐渐成为公众关注和争议的对象。社会抚养费是什么? 社会抚养费, 该不该收?



计划生育实施三十余年, 造就了一个庞大而腐败的利益群体,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后, 该腐败群体仍旧寄生于“计划生育” 的“旗帜之下”, 或“华丽转身” 为“xx 卫生健康委员会” 专事收缴“合法罚款” 专业户

### 什么是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 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 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 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性收费, 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2002 年 8 月 2 日, 国务院经国务院令第 357 号公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对征收社会抚养费问题作出了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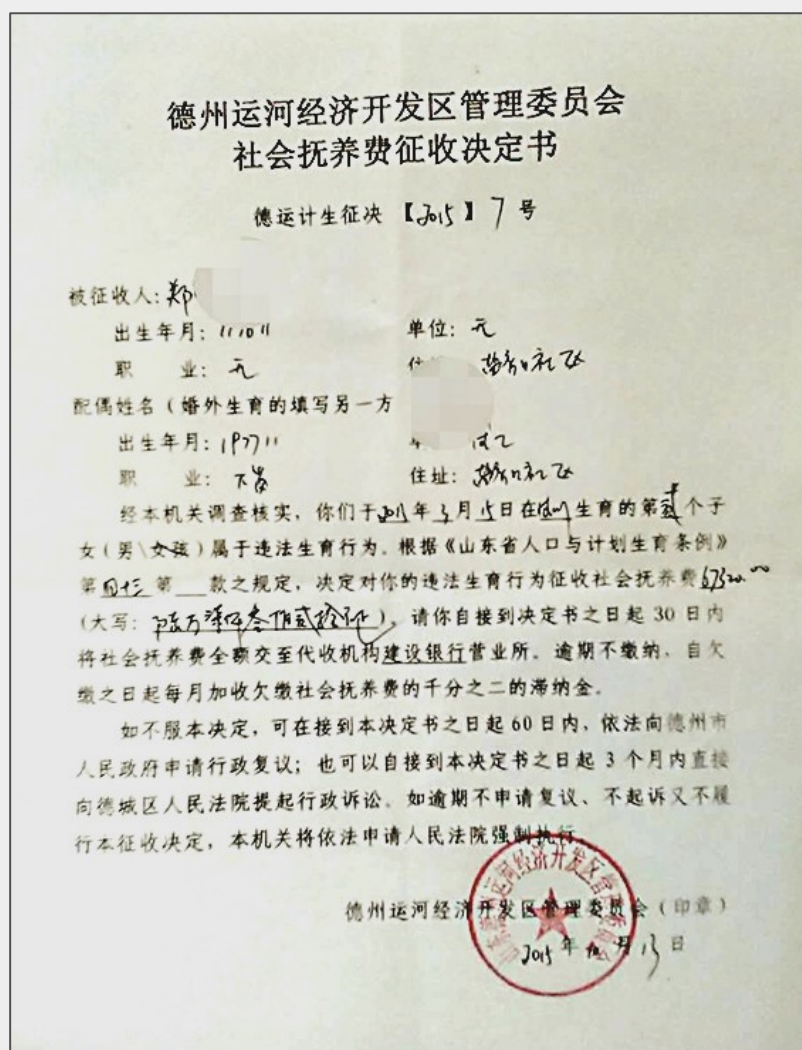
###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

据投资者报报道,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 国家计生委的官方解释是: “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 不是罚款, 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 多出生人口占据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 年收或超 200 亿

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对《投资者报》表示，“考虑到以前的超生罚款标准比现在低，并且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能力缴纳罚款，还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足额缴纳罚款，因此我作一个比较保守的粗略估计：从1980年到现在，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

记者连日来向国家计生委阳光热线12356、北京市计生委相关部门咨询有关年度超生处罚人数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统计数据，被告知没有相关数据或不能公布。记者仔细查阅有关资料，从浙江省行政事业收费统计分析报告中发现，2009年浙江收取社会抚养费8.94亿元，增幅约13%，收费规模首次超过工商。而在安徽省2010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情况的报告中，社会抚养费收入为8.45亿元，增幅达61%。



**社会抚养费交了还能不能退：**山东一“抢生二胎”家庭起诉获立案，山东德州的郑先生因生二胎被收缴社会抚养费数额为67320元整，征收主体及程序多处涉嫌违法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考虑到作为征收基数的人均收入年度增长，若以9亿元为2011年内各地省市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平均数，全国31个内陆省市总征收规模高达279亿元。

**内蒙古鄂尔多斯伊 金霍洛旗征收计划外生育对象社会抚养费标准**

2015-10-22

出生年度		西部		东部		城镇户籍	
2009年	农户计征基数7262元	应缴纳	21800	应缴纳	29000	应缴纳	40000
		一次性	15000	一次性	20000	一次性	28000
	城市计征基数20401元	分期（三年）	8700\6500\6500	分期（三年）	11600\8700\8700	分期（三年）	12000\12000\16000
		应缴纳	23800	应缴纳	31800	应缴纳	46200
2010年	农户计征基数7959元	一次性	16600	一次性	22300	一次性	32400
		分期（三年）	9500\7100\7100	分期（三年）	12700\9500\9500	分期（三年）	13800\13800\18000
	城市计征基数23098元	分期（三年）	10500\7900\7900	分期（三年）	14000\10500\10500	分期（三年）	16000\16000\21300
		应缴纳	30000	应缴纳	40000	应缴纳	61000
2011年	农户计征基数8774元	一次性	18400	一次性	24500	一次性	37300
		分期（三年）	12000\9000\9000	分期（三年）	16000\12000\12000	分期（三年）	18000\18000\24400
	城市计征基数26684元	分期（三年）	13700\10300\10300	分期（三年）	18300\13750\13750	分期（三年）	20700\20700\27600
		应缴纳	34300	应缴纳	45800	应缴纳	69000
2012年	农户计征基数10098元	一次性	21000	一次性	28000	一次性	42000
		分期（三年）	15300\11500\11500	分期（三年）	20500\15400\15400	分期（三年）	22500\22500\30000
	城市计征基数30566元	分期（三年）	16100\12100\12100	分期（三年）	21500\16100\16100	分期（三年）	21700\21700\29100
		应缴纳	40300	应缴纳	53800	应缴纳	72300
2013年	农户计征基数11452元	一次性	24000	一次性	32000	一次性	48300
		分期（三年）	16100\12100\12100	分期（三年）	21500\16100\16100	分期（三年）	21700\21700\29100
	城市计征基数34586元	分期（三年）	16100\12100\12100	分期（三年）	21500\16100\16100	分期（三年）	21700\21700\29100
		应缴纳	38400	应缴纳	51300	应缴纳	75100
2014年	农户计征基数12828元	一次性	26000	一次性	35000	一次性	52500
		分期（三年）	15300\11500\11500	分期（三年）	20500\15400\15400	分期（三年）	22500\22500\30000
	城市计征基数37582元	分期（三年）	16100\12100\12100	分期（三年）	21500\16100\16100	分期（三年）	21700\21700\29100
		应缴纳	40300	应缴纳	53800	应缴纳	72300
2015年	农户计征基数13450元	一次性	28000	一次性	37000	一次性	50600
		分期（三年）	16100\12100\12100	分期（三年）	21500\16100\16100	分期（三年）	21700\21700\29100
	城市计征基数36193元	分期（三年）	16100\12100\12100	分期（三年）	21500\16100\16100	分期（三年）	21700\21700\29100
		应缴纳	40300	应缴纳	53800	应缴纳	72300

附：1、以子女出生上一年度旗县统计部门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基数。

2、三孩在二孩征收的标准上加收 30%（前二孩都均属计划内）；第二孩已是计划外生育，

三孩在二孩的基础上翻倍征收。

资料来源：五险一金网

## 去向成谜

各地的相关法规都已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要实行“收支两条线”，“县级计划生育部门应当将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及时、全部存入财政专户”。但纳入财政之后怎么使用却并不像计生部门号称的那么阳光。

“北京、上海这几个大城市规范一点，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财政，而计生委的工作经费与社会抚养费完全脱钩。在内地省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都委托给了乡镇、街道，虽然是收支两条线，但30%到40%返给了乡镇，然后一部分补充县计生委的工作经费，只是到财政局转一道手而已。”杨支柱告诉记者，“一些地方80%至90%的收入都留在县级以下计生部门，主要用于工作人员的激励上，要不然这种得罪人的事没人干”。

据了解，《山东省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社会抚养费应当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省、市地、县(市、区)三级计划生育部门按5:10:85的比例分配使用。也就是说**社会抚养费85%的使用权归县级计生委，只要求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具体怎么花谁也不清楚。**

记者注意到，一些县级政府甚至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奖励乡镇、村一级计生专员。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地方出现为收取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对“超生”漠视、对“罚款”热衷的现象，被媒体报道为“社会抚养费抚养计生委”。**

“这样的问题确实比较普遍，其原因就在于社会抚养费本身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性质，所以最好就是干脆撤销社会抚养费”。王建勋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公开信息显示，2009年，四川内江市县(区)两级审计机关对所辖5个区县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的问题较突出，全市4个区(县)共有11344.07万元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直接在预算外财政专户中使用。

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农业税取消以后，村镇的经济来源受到了严重影响。预算内的资金又远不能满足基层的发展需要，只能靠征收社会抚养费来运转。他把这形象地比喻为“省市吃土地，县乡吃肚皮”。

近年来，“社会抚养费”这个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利器”也逐渐成为公众关注和争议的对象。

“这还是上缴财政的部分，至于村镇工作人员打白条、关系户送礼收来的钱全都进了私人的腰包，这个数目连计生委主任都搞不清有多少。”易富贤对记者表示，许多地方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连60%都达不到，难道剩下的那部分都是收不上来的钉子户吗？

## 羽戈：“社会抚养费”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看看，社会抚养费是个什么东西呢？它高举“社会抚养”的正大名目，实际上与此毫无关系。它是有法(哪怕是恶法)可依的行政收费，在一些地方却更像基层政府与民争利的生意。它与行政处罚血

脉相连，却不归《行政处罚法》管辖。它植根于计划生育，却一步一步将这项国策推向了绝路。(东方早报)

### 广东省茂名化州市 2017 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

化州市城镇居民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单方）					
(金额单位：元)					
项目类别	2016 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 (基数)	超生一个子女的 (基数的 3 倍)	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二胎子女 (基数的 2 倍)	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三胎以上子女的 (基数的 3 倍)	有配偶又与他人生育的 (基数的 6 倍)
城镇居民	21780.1	65340.3	43560.2	65340.3	130680.6
备注	1、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2、本人上年实际收入高于当地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其超过部分按 1~2 倍加收社会抚养费。 3、夫妻一方为城镇居民，一方为农村居民的分别按夫妻双方的征收标准计征。				

资料来源：搜狐网

### 2016 年顺德区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

项目	征收标准							
	超生1个子女	超生2个子女	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2胎子女的	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3胎以上子女的	有配偶又与他人生育第1个子女	有配偶又与他人生育第2个子女	符合再生育条件,生育时仍未补办审批手续	
基数	3倍	6倍	2倍	4倍	6倍	9倍	2%	
城镇居民	42259	126777	253554	84518	169036	253554	380331	845
农村居民	26860	80580	161160	53720	107440	161160	241740	537

说明：以上为当事人一方的征收标准。

资料来源：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网站

#### 相关新闻 超生的娃好“金贵”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经济特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条例(草案)》正式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按照该《草案》，超生一个子女将要缴纳 219030 元的“社会抚养费”。

[【返回目录】](#)

## 托尼·朱特：从冷战时期罗马尼亚的人口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

[ **托尼·朱特** 英国历史学家。本文节选自《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 20 世纪》(林骧华/译) 的章节《历史与欧洲之间的罗马尼亚》，标题为原编者所取。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三辉图书，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托尼·朱特** [Tony Judt 1948.1.2—2010.8.6]

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史研究专家，犹太裔英国人，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执教于剑桥、牛津、伯克利等大学\纽约大学，1995 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代表作有 60 余万字、四卷本的鸿篇巨制《战后欧洲史》，还有《沉疴遍地》、《重估价值》、及临终前的《思虑 20 世纪》和《记忆小屋》，托尼·朱特因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于 62 岁离世

使罗马尼亚问题加重了复杂化的共产主义经历并没有改变罗马尼亚问题的性质。就像罗马尼亚的政客们和知识分子们一样，缺乏安全感，有偏执狂性格，对他们的国家在新格局中的地位忿忿不平——始终认为犹太人或匈牙利人或俄国人是罗马尼亚的死敌，竭力想消灭它——**所以即便是从整个东欧的各国共产党的标准来看，罗马尼亚共产党也一样缺乏安全感和有偏执狂性格。**

在这个案例中，罗马尼亚共产党员中绝大多数是匈牙利族、俄罗斯族、犹太族人。直到 1944 年，罗马尼亚共产党才有了一位罗马尼亚族的领袖——**乔治·乔治乌-德治**——**而一旦掌权，罗马尼亚共产党人的补救性策略之一就是**用民族主义思想将自己包装起来。乔治乌-德治在 50 年代后期采取这种措施，以保护罗马尼亚利益的名义同苏联人保持距离，而 1965 年接班的齐奥塞斯库则走得更远。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西方必然承担某种责任。罗马尼亚共产党在乔治乌·德治手里比在齐奥塞斯库手里厉害，在皮特什蒂和锡格特的监狱，在多瑙河三角洲的流放地，在多瑙河 - 黑海运河的劳改营，都比在波兰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见到的情况更糟。然而西方各国政府不仅没有谴责罗马尼亚独裁者们，反而给予各种支持，它们从布加勒斯特的独裁者们身上看到了滋生一个新铁托的希望。



**齐奥塞斯库**

1965年齐奥塞斯库当上罗共中央给总书记和总统，家人全部安插在党政军高位，上世纪70年代访问中国和北韩后得到启发，于当年开始效仿中国搞个人崇拜、在罗发起了“文革”运动，齐统治时期罗马尼亚遍布秘密警察，1989年12月罗马尼亚爆发革命，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25年的独裁统治，其本人及其妻子被枪决，罗马尼亚政府在处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后宣布永久废除死刑

理查德·尼克松于1969年8月访问布加勒斯特，成为第一位访问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美国总统。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在1978年访问罗马尼亚时，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魅力所倾倒，称赞他是“全世界军备控制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同年，英国政府邀请齐奥塞斯库夫妇作国事访问；迟至1983年9月，其时关于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可怕事实已经广为人知了，副总统乔治·布什仍然形容他是“欧洲的好共产党人之一”。

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他可以是个‘老共’，但他是我们的‘老共’”）使齐奥塞斯库得到了回报，这不光是因为他与理查德·尼克松和英国女王过从甚密。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国组织里第一个进入关贸总协定（1971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2年）、欧洲共同体贸易优惠国（1973年）、美国优惠国待遇（1975年）的国家。西方的赞许阻碍了罗马尼亚国内的反对派，尽管这一点帮助不大。没有哪一个美国总统会要求“让罗马尼亚成为罗马尼亚”。

即使罗马尼亚掀起一场类似“团结工会”的运动，也不见得会得到西方的任何支持。因为罗马尼亚领导人乐于批评俄国人，并且将自己的体操运动员送到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去，美国和其他人都不会对他在国内的行为说三道四（至少直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崛起，在此之后，西方认为一个反苏的不同政见独裁者已经无用）。事实上，当齐奥塞斯库在 80 年代初决定用缩减国内消费的办法来清偿罗马尼亚的巨额外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他是赞赏有加的。

**但是罗马尼亚人为齐奥塞斯库的自由行动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为了增加人口——这是传统的罗马尼亚主义（Romaniansist）的心结——在 1966 年，他下令禁止 40 岁以下并且少于 4 个孩子的妇女堕胎（1986 年将年龄界限提高到 45 岁）。1984 年，女性最低结婚年龄放低到 15 岁用建立全体育龄妇女的强制性每月健康检查制度来阻止堕胎。假如允许堕胎的话，也必须有党组织的代表在场。医生管的地区若是出生率下降，医生就会被降低工资。

人口并未增长，反倒是由堕胎引起的死亡率大大高于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唯一可行的控制生育的手段，非法堕胎大行其道，却往往处于最骇人听闻的、最危险的条件之下。**在 1966 年法规下达之后的 23 年里，死去的妇女至少有 11 万人。确切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所以在 1985 年以后，新生婴儿在活到第 4 个星期之前不做官方出生登记——这是典型的控制知情权。到齐奥塞斯库被推翻的时候，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是 2.5%，而被送进孤儿院的儿童达到 10 万名以上——这个数字稳定到目前。到世纪末，在康斯坦萨市的东部，遭遗弃的、营养不良的、生病的儿童消耗了 25% 的财政预算。



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社会主义胜利大道”，  
他下令大规模拆毁古典建筑、包括拜占庭时期的教堂和贵族宅院，  
耗费巨大资源为自己建造的超级豪华宫殿，并大搞“计划经济”，建起千篇一律的火柴合式楼房，  
1981 年罗共开始实行面包配给制，食品定量精确到居民“每年鸡蛋 114 个半，土豆 45.5 公斤”

这种民族悲剧的背景，是一种蓄意将落后变为赤贫的经济。为了偿还西方的债务，齐奥塞斯库迫使国民出口每一种国内生产的商品。罗马尼亚人在家里只准使用 40 瓦以下的电灯泡，以使能源出口到意大利和德国。肉、糖、面粉、黄油和鸡蛋等许多东西都是配给的。建立固定名额制来实行政治和节日的义务公共劳动（就像法国古代政权下的劳役制度一样）。汽油的使用被削减到最低限度，1986 年设立一项养马计划，用以代替机动车辆。



下令：“**不要向群众开枪**”的将军——**瓦西里·米列亚** [Vasile Milea 1927.1.1——1989.12.22]

前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大将军阶，军事家、国务活动家，1989 年 12 月 21 日，米列亚不但拒不执行齐奥塞斯库向示威民众开枪的命令，反而向军队下令：“不要向群众开枪”。

为此士兵仅向天空开枪，而无一向民众开枪，

齐氏再次下令向示威人群开枪，米列亚仍不执行，22 日凌晨，米列亚举枪自杀。

22 日早 7 时，安全部队装甲车冲入数十万布加勒斯特示威人群用机枪扫射造成多人死伤

15年后，人们今天在摩尔达维亚或特兰西瓦尼亚乡村旅行，会看到这样的结果：马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收割靠长柄大镰刀和小镰刀。**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依靠对体系引起的短缺实行中央控制。**在罗马尼亚，一种以过度投资于不需要的工业硬件为基础的经济，一夜之间转为一种以工业时代以前的农业生存方式为基础的经济。回归的道路将会很长。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经济政策有一种谬误的逻辑——毕竟罗马尼亚还清了它的国际债务——这在共产党执政以前的各个时代并非没有些许地方性的先例。然而他的城市化计划却简直是犯罪。他提出将罗马尼亚的13000个村庄的一半（不成比例地从少数民族群体中挑选）“系统化”为558个农业城镇，这将会摧毁这个国家留存的社会结构。他实际上摧毁了布加勒斯特的一部分，其面积等同于威尼斯，使城市面目损坏。**4万幢房屋夷为平地，只为建造“人民之家”和一条5公里长、150米宽的“社会主义胜利大道”。**前者像齐奥塞斯库的私人宫殿，由25岁的建筑师安卡·彼得雷斯库设计，不矫揉造作。前面是一个无形的半圆形空间，可以容纳50万人，大楼庞大（大厅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非常难看，非常笨重，令人感到痛苦，毫无趣味，它唯一可能具有的价值是供人作比喻。

至少这里面有点意思，这是罗马尼亚对极权主义的城市化规划的一种奇特贡献——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特鲁希略、金日成，现在的齐奥塞斯库，都是这种突出的类型。这种风格既不是当地的，也不是外国的——这些都不过是外观。在“社会主义胜利大道”闪闪发光的白色街面背后，通常都是肮脏灰色的预制水泥，就在几百码开外，都是可怜的住宅街区和路面布满凹坑的道路。但是大道正面显示出雄心勃勃的、咄咄逼人的、坚定严厉的统一面貌，**令人想起极权主义永远是千篇一律的；或许这就是它为什么让千篇一律和“和谐一致”——以及与“外国的”不一致形成对比——作为一种长期的政治上先入之见，对狂热的独裁者有特殊的魅力。** ■

[【返回目录】](#)

## 荣剑：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 [上]

[被采访者：独立学者荣剑，采访者：FT 中文网编辑王昉。本文为 FT 中文网“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专题文章之一，首发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 FT 中文网]

**原编者按** 本文为 FT 中文网“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专题文章之一，基于独立学者荣剑与 FT 中文网编辑王昉的一次深度对谈整理而成，试图从社会思潮的维度，探究这场改革得以发端和推进的根本动力，以及造成眼下改革停滞以及诸多社会矛盾的深层原因。

荣剑为独立知识分子。上世纪 80 年代，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博士生的他深度参与和见证了思想界几场重要论争。90 年代初他因故被迫下海谋生，近年成为艺术藏家与策展人。2012 年他重返公共舆论场，对时局与社会热点密集发声，展现出深厚的现实关怀、批判精神和学理储备。

在本次访谈中，他回顾了过去 40 年间中国思想界的递变与分裂，梳理了目前几大主流思想阵营的主张与交锋。《庄子·天下》言“道术为天下裂”，意为学术由最初的混沌状态向诸子之学分化。过去 40 年，中国思想界也经历了从共同启蒙到尖锐对立，从学理之辩到意识形态之争的过程。思想迟疑，则改革必然徘徊。我们讨论道术之“裂”，是期冀寻求让它重“聚”与对话的可能性。以下为编辑后的访谈实录。

### 一、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史：从思想的年代到主义的年代

**FT 中文网：**可否先请您梳理一下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社会主流思潮的变化过程？

**荣剑：**从编年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思想史，我把这 40 年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80 年代的 10 年、90 年代的 10 年和新世纪之后的 10 年（至 200 年）。2010 年之后到现在，可以另行表述。对这三个 10 年，我用了三个关键词：思想、学术和主义，80 年代是“思想的年代”，90 年代是“学术的年代”，而新世纪以来的 10 年是“主义的年代”。

首先看 80 年代的这 10 年。现在不少人都在回顾、总结 80 年代的辉煌历史。这期间发生了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等好些推动了中国改革进程的重大事件。

一些 80 年代的总结者试图作为那段历史最权威的解释者发声，因为他们亲历了这个历史过程。他们希望能够在历史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给自己一种评价。亲历者当然很重要，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史家的观察其实是有差异的。亲历者在回忆自己参与的历史过程时，不免会带上自己的判断和价值观，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历史的公正客观的认知。当然，原始的史料和经验，又必须由亲历者提供。这就涉及到一个悖论。从我自己而言，我亲历了 80 年代思想界的几场重要争论，我是更愿意从一个史家的角度，站在更远一点来观察，看看能不能把这两种身份结合在一起。

我 1983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就在那一年，中国思想界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党内思想分裂的开始，一方以周扬、王若水为代表，后面还有一大群为他们提供思想资源和支持的民间知识分子，另一方由胡乔木、邓力群这些党内理论家为代表，他们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最权威的诠释者。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为什么会一下子把党内的争论给集中爆发出来？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实不光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所有苏东国家在解冻时期或思想解放时期，都面对过这个问题。在东欧，比如匈牙利、南斯拉夫，包括苏联，早已开始研究人的问题，研究为什么在极权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会出现这么多非人道的东西。异化理论的针对性更明显，就是说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异化到自己主张的价值的反面去了。马克思所批评的异化，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即商品拜物教。到中国这个体制下，就是权力拜物教。这两个大问题被提出，必然涉及到对现有体制的批判。当时的争论非常激烈。批判者认为，这个体制是一个非人道的制度，是一个异化的制度。但在胡乔木邓立群这方看来，人道主义是个资产阶级的话题，是资产阶级拿来进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哪有异化？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异化。

这个问题的背后，实质是党内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争夺。胡乔木之所以对周扬当时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这么反感，是因为他认为周扬把党的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拿过去了，而本来这个权力应该是他的，因为他是党内意识形态的最高首长。文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王若水，在 60 年代就开始研究异化问题了。他在 1978 年写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后来收入一本集子，里面还包括李泽厚等人的文章，都谈到了人的问题，主体性的问题。这其实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核心问题。当时我的导师也参与了争论，他们支持胡乔木的观点。我们一些年轻学者，则更加接受南斯拉夫实践派，包括苏东异见分子的一些观点。当时凡是主张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的人，都受到了打压。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党内对周扬做出非常严重的处理，后来周扬患精神病与此有很大关系。这反映出文革过后，党内在处理思想问题时的极端粗暴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周扬提出的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一个理论问题，是可以充分讨论的。但胡乔木这些人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组织了一批大学理论家，对周扬进行了粗暴的批判，包括对他人的羞辱，让他到人民日报发表检讨，这些都是非常粗暴的做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80 年代的思想争论，核心在党内，是党内的思想解放与保守之争。争论双方都在马克思主义这同一个话语体系内，借用的理论资源也都源于这个系统。在这之前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理论务虚会，也都是由党内发动的。

当时民间力量也非常活跃，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源，比如当时有《走向未来》等三大丛书，大量地引进了西方思想。民间知识界或者思想界，基本上是在思想解放这一边的。总的来说，这 10 年里，知

识界没有分化，是一个混沌的整体。我们现在看到的左右之分当时还没有暴露出来。民间力量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程度——现在体制外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体制内，因为现在党内的理论资源已经基本上枯竭，所谓的“理论自信”已经没有人相信了。



上世纪 80 年代《走向未来》丛书（部分），该丛书曾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80 年代的思想，是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说的，原创性思想有多少，不好说，更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是“托马改制”，以及从西方引进大量思想读物和在此知识背景下所进行的思想启蒙。

1989 年那场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进入了一个和 80 年代完全不同的 10 年。有人把 90 年代的 10 年概括为——“思想退出了，学术出场了”，或者是“思想家退场了，学问家出场了”。

思想家和学问家有什么区别？思想家要对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独创性、开创性的看法，以及对如何解决问题提出战略上和策略上的思考。他们关心实体正义，一般都会有经世致用的主动要求。而学问家着眼于知识的积累和阐释，更关心程序正义，不求经世致用，只求把学问做好。学问家研究问题的时候讲究工具理性，保持价值中立，先做事实层面的判断。比如说，放在面前的究竟是一只杯子还是一只碗？如果你说是杯子我说是碗，那就没法继续讨论下去了，所以先要把事实搞清楚，再来讨论这是不是一只好杯子或这个碗对我有什么用。在我看来，90 年代的学问家们追求的是以程序正义为导向的知识建构。

在 90 年代的 10 年里，80 年代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在学理上被进一步深化了。学问家门纷纷寻找这些问题的知识学起源，或者从知识学的角度来对这些问题加以展开和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比如说，他们会细细考证法国革命史的来龙去脉，或者经济学的发展，法学的发展，遵循知识学建构的一系列规矩，将学问更加专门化。我曾写过一篇《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文中提到的自由主义第

二波，就涉及到 90 年代的学术建构阶段，当时出了一大批很好的学者。自由主义过去只是一个概念，一种思想，在 90 年代的研究中，人们知道自由主义还有很多派别，有左派的自由主义，有保守派的自由主义，有苏格兰学派，等等。这个学术建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也因为学术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派别，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思想界开始分化。80 年代时处于一个阵营里的、都站在思想解放旗帜下的新左派和自由派开始分裂。

新世纪之后，中国思想界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主义的年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马立诚先生总结过八大主义。主义的时代，有一个基本的导向，就是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是价值判断优先而不是事实判断优先。价值判断优先的直接后果是，与 80 年代相比，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巨大分化，完全改变了中国的思想生态。在主义的支配下，不同主义之间的对话变得非常困难。比如新左派不愿和自由主义阵营对话。

**FT 中文网：先问一下，您自认为是哪个阵营的？**

**荣剑：**我当然是自由主义那一派的。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思想上中左，政治上中右。思想上中左，就是看重公平正义；政治上中右，就是以宪政为导向，追求自由和个人独立。

**FT 中文网：比较接近罗尔斯的立场。**

**荣剑：**我比较欣赏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西方关于理性观，原来只讲两个理性，一个叫工具理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学术建构所追求的理性，放弃价值判断，先把“是杯子还是碗”的事实搞清。还有一个就是价值理性，就是这只杯子好不好，要做价值判断。在这两个理性之外，哈贝马斯又提出了“交往理性”。他说，人与人的交往，需要沟通，需要对话，而对话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话的双方都是主体。原来人们所理解的交往关系，我是主体，你是客体，你是我的对象，由我来给你宣示我的观点。但哈贝马斯说，我们两个都是主体，我们平等沟通，这就是“主体间性”。我曾经说过，与其读哈耶克，不如读哈贝马斯。

回到刚才所说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阵营不愿对话的情况。大概在 2012 年，我原本计划与新左派的一位主要思想领袖做一次对话，邮件沟通过几次，他也同意，但我的一些右派朋友听说了就不高兴——你凭什么去跟他对话？没有必要对话。最后这个对话没有实现。这说明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正常的学术对话也变得非常困难。现在的自由派都拒绝阅读新左派的书。

**FT 中文网：一旦有了意识形态，就要在政治上站队？**

**荣剑：**当然有政治正确了。比如说，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裂，从没像现在这样达到这么尖锐的程度。民主党对特朗普反感至极，脱了裤子把屁股对着特朗普大厦。他当选以后，我打了个比喻，这就好比在中国，司马南当选了总统，那自由派不是要气死了吗？反感到这个程度，就是说，已经不考虑事实判断了，完全以自己的价值好恶来做出判断。主义的年代，主要的问题就在这里。意识形态让中国整个思想界高度分裂。

**FT 中文网：自由主义和新左阵营，是因为那起《读书》事件彻底决裂的吧？**

**荣剑：**这个事件加剧了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分裂，尽管在这以前他们的分歧已经非常深刻，但至少还可以对话。90 年代的学术化建构，并不完全是在一个价值平台上进行的，各派会有各自的价值立场。自由主义的研究，新左派的研究，问题立场方法都不一样。但至少来讲，90 年代的研究，都还是一种学术化的研究。

**FT 中文网：一个原因是否是，一些中国学者在 90 年代扮演的是西方思想的“引进者”，只是研究和介绍西方理论，到了新世纪，各种思想被他们内化了，他们纷纷变成了所研究的思想的“举旗手”？**

**荣剑：**这是一方面，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每个人都会有其知识学上的比较优势。比如说刘小枫，他一开始是研究宗教，宗教是比较超越的，注重“道”的研究，后来他研究施特劳斯和施密特，越来越走向国家主义，走向了“器”的研究。这种思想转变和他的知识学转变有着很大的关系。我是研究马克思的，即使到现在，我分析问题时仍然会大量使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因为我认为这种分析框架仍然是有效的。

另一方面呢，各种思想开始和政治高度关联。执政党也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学术上的理论支持。这涉及到我要讲的下一点，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的丧失。

##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丧失了学术合法性**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一种学术语言了，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当下问题的时候，已经无法取得学术的合法性。它也不是一种思想语言了，而只是一种宣传的语言。不同的学派在讨论一些公共问题的时候，已经不会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讨论了，连新左派也是这样。他们或许愿意引用西方所有左翼的思想资源，但是也不愿意引用马克思的话。少数几个人可能会去马克思那里，找到只言片语来进行点缀，也就是点缀，已经不再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比如说像崔之元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我以前讽刺过他——他所用的三个主要的分析工具，用来论证重庆模式的正当性，都是来自于美国人。而他觉得这是一种时尚，是他的理论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新左派所抛弃。

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他的社会历史理论，在分析社会问题时，还是有其有效性的一面。西方的新左，比如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霍布斯鲍姆、伊格尔顿、安德森这些非常知名的学者，都大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分析问题，分析得非常漂亮。但我们的新左派都不愿意运用马克思主义了。

**FT 中文网：这很有意思。这是因为西方没有真正体验过这套意识形态的幽暗之处，所以还对它抱有某种幻想吗？**

**荣剑：**不同国家制度下的语境的确不同。今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年，《纽约时报》发了篇文章：《马

克思是对的》，连这样的文章都出来了。对整个西左，欧左，和所谓的白左，马克思主义是他们主要的一个理论来源。吉登斯是英国工党的理论教父，他在讲到英国工党的思想资源的时候，提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工联主义，还有费边主义，这些都是他们的思想资源，他们对不同的思想采取开放性的态度。还有哈贝马斯，他专门写了本书叫《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也很有名。

**FT 中文网：90 年代的 10 年中，学者们在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上取得很多建树，马克思主义阵营这边呢？为什么在中国这么一个号称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度，对它的研究却没有深化下去？**

**荣剑：**马克思主义在 90 年代被自由派和新左派共同抛弃了。这是因为 80 年代，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被强行粗暴中断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党的系统里面就已经完全彻底破产了。它成了一个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的证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证明，变成了一个宣传的工具。这种情况不光是在中国存在，苏联当时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没有脱胎换骨，没有在 80 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掌握这个有利条件脱颖而出，改变自己。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英国新左派的方式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方法，也不至于让它在 90 年代彻底丧失学术合法性。新世纪后的中国的主要政治思潮，马立诚总结为八大主义，萧功秦总结为六大主义，都不包含马克思主义。这个情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件比较可悲的事情。



2018 年 5 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中国向其德国故乡特里尔赠送一座高 5.5 米巨型雕像

我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进行对话时说，马克思主义在这 20 年里面，没有对当前的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作出回应，人家也没有按照你们的理论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你们充其量只是研究马克思哪本著作里面说了什么，试图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原来说的和现在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是两个概念，仅此而已。

**FT 中文网：从对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纪念语调来看，中国官方仍然高举着马列的意识形态大旗，虽然如您所说，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学术正当性，而且中国的社会性质早已背离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径。在国际社会上，我们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固守，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的孤立处境。既然我们本质上已经不是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又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负累，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扛着这面旗帜？**

**荣剑：**这也是许多人大惑不解的问题。在现在的情况下，再去学共产党宣言，再去讲共产主义，不光是领袖在讲，马云也在讲，刘强东也在讲，还穿着红军的服装，还要去背马克思的著作，太荒唐了，这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现在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公开说要实现共产主义？

从执政党角度来看，它没有其他理论资源，只能抓住这个东西，来为它提供一个所谓的信仰上的支持。在它看来，信仰世界已经崩溃了，不光是社会上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在党的系统里，有几个信的？它当然知道这个情况，它是知其不为而为之，知其不能而能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堂吉珂德，试图以一人之力来改变这种情况，来重新建立一个信仰系统。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诞的一个事情。哪怕用儒家的东西，拿新左派的东西，都更好些吧。或者按照原来邓小平讲的，不问姓资姓社，不争论了，闷头搞经济，也可以。你为什么要扛起这个旗帜？

在 2012 年以前，有过一个说法，叫做“卷旗不倒旗”，张木生他们提出来的，就是旗子卷起来，我不打开了，但旗杆还抱着。那也可以啊，至少世界上不至于这么惊诧，都 21 世纪了，你怎么还在搞这些东西？

回看新世纪的这十几年，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在加剧。正常的思想研究、学术研究，不得不跟政治发生联系。比方说，90 年代时，新左派还处于边缘化状态，并没有被吸收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里面去。但现在，新左派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最主要的理论支持。

**FT 中文网：中国的新左派，与西方新左，差异似乎越来越大。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新左越来越靠近国家主义。**

**荣剑：**对，成了国家主义的帮凶了。在欧洲的思想谱系里，新左派都是批判国家主义，批判政府的，比保守主义更批判政府。现在我们这里反过来。在中国的政治思想谱系里，左跟右之间会发生一个变化，我们认为是左的东西，在西方来讲可能是国家主义的，甚至极右的东西，因为国家主义是属于极右，现在我们极左变成极右了。我在分析日本的左派时也讲过，理论上的左派，和政治上的右派高度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在马克思主义不能再有效地整合国民的思想时，执政党突然意识到，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理论手段来完成这个任务。自由主义强调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是被排斥掉的。执政党主要吸纳的就是新左派、儒家、还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民族主义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已经成为现在执政党公共宣传的一个主要工具。其他的学术性的建构，主要来自新左派。原来新左派还保持一定

的学术独立性。汪晖在 90 年代写过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是关于扬州一个工厂的调查，对这个扬州国有企业的改制提出了许多问题，可以看出他对底层民众的一种关切，到了 21 世纪以后都变了，全面拥抱国家。

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阶级的肉身在哪里？》，回应一位年轻的新左派教授罗纲的一篇文章。我在文中问，新左什么时候为工人说过话？为底层说过话？本来最应该为他们说话的是你们。现在你们不说话，凭什么叫新左？

**FT 中文网：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各种主义是不是正越来越围绕着政党站队？**

**荣剑：**最近这几年，仍然还没有超越这个“主义的时代”，正常的学术研究和思想研究更不能正常展开了。这几年言论控制这么严，只要写到宪政，就不让出书了，必须改。2012 年是个重要的时间窗口。秦晓主持的博源基金会曾要给我出一本书，就是《中国能否告别革命？》，书号当时都已拿到，后来没法出了。在 2012 年，我为这个书写了一个前言，把那一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重庆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是，在 2012 年，对于一个新的领导执政集团上台，我们还是抱着比较高的一个预期。为此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80 年代的出场与返场》。习李都是 80 年代的这一批人，所以我当时预测说，未来 10 年，也就是从 2012 年到 2022 年这 10 年，可能会是 80 年代的一个延续，至少能延续 80 年代解放思想的传统。但现在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从 2012 年到今天，这 6 年所发生的事情，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可能只有少数几位先知预见今天的情况。胡温那 10 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政治上非常停滞，不作为不折腾，大家也忍受够了。现在突然发现，那个时候还不错，至少微博还可以开，微信公众号还不会被人家封掉。现在则已经到了滥杀无辜的一个状态。 ■

[【返回目录】](#)

## 张林：应不应该抛售美国国债

[张林 中国奥地利经济学 50 人论坛研究助理。本文首发于 2018-8-18《中国经营报》]



面对日益升温的中美贸易冲突，国内外有些学者建议，可以通过抛售美国国债来打击美国经济。理由在于，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抛售美国国债可以压低美国国内政府债券的价格，抬升政府债券的利率，从而迫使美国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同时打击美国经济并削弱美元信用。上述建议并不符合经济理论和事实，也不符合中国政府的战略利益，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概率很低。

即便可以抛售美国国债，抛售的方式也不同：一种是一次到位的大量抛售，一种是渐进的逐渐减持。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显著的负面效果，而其对美国产生的负面效果却是不明确的。

截至 2018 年 5 月份，美国政府尚未兑付的政府性债券，即美国国债，共计 20 万亿美元左右，其中包括 3.8 万亿市政债、13.9 万亿财政债以及 2 万亿联邦债。20 万亿美国国债中又有 6 万亿为外国投资者所持有，其中中国央行持有 1.2 万亿，占美国国债总数的 6%或美国外债份额的 20%。这 1.2 万亿美元国债计入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

除了中国和美国之外，GDP 总产值达到 1.2 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只有 9 个，其中又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只有日本和德国 2 个，而且日本在数次减持后仍然持有 1 万亿美债。这意味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成为中国大量抛售的债券的买家。况且，即便是中国能够如数变现美国国债的票面美元，持有美债与持有美元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美元很难因为一次性的减持而丧失其国际货币的地位，中国央行也几乎不可能再将美元变现为其他更有利的资产。

如果希望通过一次性大量减持美国国债，对美国造成足够大的冲击，除非中国能将债券价格压到足够低的水平。但降价抛售美债，变现的美元会显著低于票面数额，这不仅直接使得中国央行的资产大大缩水，而且会长期削弱中国的外交影响力和资本输出能力。

持有充裕的美元对于中国外交是重要的，对亚非拉国家的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仍然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努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也需要通过将资本输出到亚洲、非洲甚至欧洲，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经济共同体，人民币和中国资本的新空间才能得以开辟。在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之前，完成这些重要的外交动作、实施对外投资，都需要大量的美元储备，美元储备的稳定也就变得非常重要。而投资美国国债，是使得美元储备保值增值的必然选择——即便不是最好的，也是最不坏的。

一次性大量减持美国国债，唯一可能的买家是美国政府自己。上面提到的 20 万亿美国政府性债务总额中，包括养老基金在内的美国职能部门自身持有约 5 万亿的份额，意味着其有能力对手赎回中国的大量债券减持，后果则是美国财政赤字的翻倍——这是美国所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当然美国也可以简单地通过印刷现金来偿付部分赎金，这会损害美元信用，但是美元贬值的损失却是由众多美元储备国共担的。

渐进的减持美元要比一次性减持现实得多。少量的但不确定地减持美元，反而更能影响市场的预期，引起美国债券的价格降低而利率走高。今年 4 月份，俄罗斯减持了 474 亿美元国债，引起了 2012 年以来 10 年期美国国债利率首次突破 3%。类似的，今年年初由于受到美国加息影响，中国曾考虑停止增持美国国债，也引起了美债利率的短暂上浮。

但是，通过美债利率的提高，推高美国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增加美国经济损失的想法，实际上弄混了因果关系。由于美国目前处于经济景气周期，企业和居民借贷意愿和还贷能力较强，联邦基金利率这样的基准利率才有上升的空间。联邦基金利率决定了美债利率的最终走向，债券价格是以基准利率为锚，而并非相反。抛售债券当然会压低其价格、使其利率上升，但只能在短期有效。

俄罗斯对美元的集中减持引发了美国国债利率在 4 月底上升到 3%，5 月底之后该利率重新回到 3% 以下。年初来自中国停止增持美债的消息仅让美债利率的上升维持了几个小时。这意味着，只要美国的经济基本面没有大的改变，减持美债对美国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债券市场的波动并不一定能伤及美国经济基本面。1994 年美国经历了“债券大屠杀”，10 年期美国国债利率在 98 天之内上升了 31%，上万亿美元的财富消失在账面上，但当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依然达到了 4% 的水平。

除此之外，美联储同样也有相机抉择的能力，不能假设在中国央行抛售美债时美联储会无动于衷。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就是一种对冲的工具。因此，从减持美国国债到美国实体经济遭受挫折之间有很长的，甚至矛盾的逻辑链条，而美国国债价格的下降对中国央行资产的降低却是直接的。

可以说，即便抛售美国国债有效，也需要首先找到美国经济下行的时机，才能依次强化经济波动的负面效果。从汇率形成机制上来说，减持美债获得美元相当于增加了离岸市场美元的供给，供给增加则意味着价格的走低，美元的汇率走低更不利于中国的出口。

实际上，债权人都希望债务人的日子能够过得好，更不希望美国用印刷钞票的方式稀释其债务负担。为了互相伤害而抛售美债，一定会带来日本、英国等其他债权国的外交及政治压力。相比中国国内

的 M2 增长速度，美元的供给可以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一旦其他债权国联合起来给中国戴上恶意抛售的帽子，反而给了美国滥发美元的口实。

中国外部环境的收紧将是一个长期事件，外汇储备的增加也将会从此进入慢车道。中国经济和社会能否安然脱身并进入良性循环，依靠的还是继续改革开放、经济转型，而并非依靠外交斡旋中伤害对方的机巧。而且以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来看，在美元仍然是主导储备货币的基础上，在美国当前经济景气上升的背景下，抛售美国国债对中国来说弊大于利、不合时宜。

贸易冲突往往容易陷入“比比谁更惨”的糟糕逻辑，可以说，抛售美国国债是强化这一逻辑的最好催化剂，中国不应采取这样的战略选择。 ❏

[【返回目录】](#)

## 张维迎：没有思想市场，世界会怎么样？

[张维迎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



张维迎教授

任何社会变革，都从观念的转变开始。观念是思想市场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市场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思想市场的竞争程度或者自由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更宽松，有时候受限制更多。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有些国家的思想市场竞争性比较强，有些国家比较弱。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竞争性最强的时期是春秋战国。那时候思想比较自由，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流派，最后形成了现在所谓的中华文化。在秦灭六国后，秦始皇觉得儒生老爱发表意见，会威胁到他统治的合法性，就搞“焚书坑儒”，开始了思想禁锢。到了汉代，思想市场慢慢开始恢复，但后来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法定垄断地位。

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看起来不一样，一个坑儒，一个尊儒，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思想市场衰落了。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大小小的王朝走马灯似的，眼花缭乱，这时候思想市场反倒又活跃起来，佛教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兴盛起来的。到北宋时，思想市场也比较活跃，因为开国皇帝立下规矩不杀知识人，犯再大的罪也不杀，所以产生了新儒家，就是以朱熹代表的理学。理学在明朝获得了垄断地位，科举考试全要按照朱熹的注释答卷，持不同观点者就成了异教徒，思想市场又萎缩了。满清以后，从康熙开始一直到乾隆都搞“文字狱”，思想市场变得非常弱小，虽然还有些学者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可能唱反调，但大部分没有好下场。最后到满清末期，社会危机频发，思想市场再度活跃起来，西方的思想也慢慢引入中国。

这是中国思想市场的大体演变历史。

西方从 15 和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最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其实是思想市场的产物。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跟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市场的差异。

简单来说，西方出现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其基本特点是，多中心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并存。相反，中国的思想市场却经常受到太多的约束和干预。

### **先看看生产思想的环境**

16 世纪开始的时候，欧洲有 500 多个大大小小的政体相互竞争，这给思想家留出了空间。学者可以自由流动，某个国王不喜欢你，另一个国王可能会保护你。法国的伏尔泰逃难很多年，总有地方可以躲，他的著作也能在法国流传开来。西方世界政体有界，但思想无界，学术界是个统一的市场，思想可以跨越政治边界，学者们都讲拉丁语，不管人在哪里都不会影响他们在学术界的声誉。所以思想家不太在乎自己所在的政体，更在乎的是在整体学术市场上的声誉。这种状况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传播思想，有充分的自由，好像也没有语言障碍。

西方的知识生产主要在民间(包括教会办的大学)，中国的知识生产主要在官府。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学者大多数都是官员，当然偶尔也有几个官场不得志的或者没考中进士的。西方人生产知识主要是为了知识本身，用知识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中国的官僚生产知识，如果某个观点跟他的官位发生冲突，就只能选择放弃。这带来非常不同的后果。

举例来说，发动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批评天主教会腐败，罗马教皇判他为异教徒，要德国的皇帝执行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之前，皇帝必须把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召集起来，开个听证会。听完听证会后马丁·路德在回家的路上，被萨克森选帝侯 Frederick 派来的几个当兵的“劫持”，藏了起来，一藏就是一年多。教皇以为他已经死了，其实他还活着，躲在一个城堡里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等他再露面时，德文版的《圣经》流传开来，宗教改革势成熊熊烈火，任谁也灭不掉了。

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中国有一个学者叫朱之瑜，生于 1600 年，活了 82 岁，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学者”。清朝入关时他还忠于明朝，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活动，南明灭亡后先逃到越南，最后到日本并死在那里。他在日本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崇，成了日本大名政府的顾问，著有《朱舜水集》。但是在中国，他的著作一直到 19 世纪晚期才发现，大家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学者。这还算是好的。朱之瑜算逃出去并活了下来，很多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活不下来。

### **再看看传播思想的环境**

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但有一项研究估计，从 1522 年到 1644 年（也就是明朝的后半期）欧洲出版的图书数量是中国的 40 倍。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在 1445 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机，50 年时间里印刷机在欧洲扩散到 250 个城市，出版了 1500 万到 2000 万册图书。反观中国，毕昇在 1045 左右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古腾堡早了 400 年，但是到 1800 年之前中国书籍出版还是靠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使用，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版在民间，都是私营企业做出版，为了传播知识；而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出版主要由官方控制，出版是传播政令和控制思想的工具。古腾堡是一位企业家，毕昇没有成为企业家。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学者，也写了不少著作，但很少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像元代的农学家王祯于 1313 年完成了《农书》，到 1530 年时全中国只留存了一本。明代的科学家徐光启于 1627 年完成了《农政全书》，却到他死后的 1637 年才得以出版。明朝末年的宋应星于 1637 年完成了《天工开物》，该书被誉为 17 世纪中国的工艺百科全书，但唯一留下来的版本是在日本偶然发现的。

《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共有 2 万多卷，可是只制作了 3 套，现在已没有完整的版本。这些科学家写了书，但是没有出版或者没有足够多的版本流传于世，知识怎么传播呢？反观西方，比如法国的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发行量达到 25000 套，传播效果完全不一样。而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只印刷了 7 套，其中 4 套保留在皇宫里。乾隆时期焚烧的书和选编进去的书，在数量上可能差不多，而且编进去的好多书可能被篡改过。

在西方的思想市场上，学者追求新颖，总会有人来挑战现有的理论，包括亚里士多德体系在科学革命以后就被抛弃了。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这跟以前“上帝创造人类”的说法完全不一样，颠覆了原有的思想体系，但能顺利出版并流传开来。而中国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证明原来的理论上，即使后来清朝出现所谓的考证学派反对朱熹，认为朱熹说的东西跟孔子的原意不一样，但他们只是要证明汉代之前的那个版本是对的，而不是去挑战儒家的思想。

计划经济之所以给中国造成灾难，很大的原因也在于当时没有思想市场。我们可以设想，大跃进时有多少人真的认为那是好事情？如果允许表达不同意见，肯定会有人会提出批评，这事儿就搞不起来或者只能在局部搞；但不允许批评的话，往往会在一条路上走到黑。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改变人的观念，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

亚当·斯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之一，因为他改变了人的观念。在亚当·斯密之前，如果说某个人为自己谋利益，这个人就不道德；亚当·斯密则证明，一个人谋自己的利益，也可以给社会带来好处，所以谋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还说自由贸易可以改进双方的利益。这些思想都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由于亚当·斯密的贡献，后来英国才废黜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走向自由市场。在过去 40 年里，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让中国人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理念，不再相信计划经济、人民公社、铁饭碗和大锅饭，转而相信市场竞争、私有产权、企

业家精神。

### **猪是如何被圈起来的？**

任何思想都是个体思考的产物，集体不会思考。一种有价值的新思想在出现之初，一定只被少数人接受。如果没人反对，往往说明这套东西不是新的。这是任何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所以，学者必须有独立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对人类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洛克菲勒曾说：“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独立性，他的智慧就会降低。”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一个农民养了一群猪，有一次出门时忘了关圈门，猪都跑了。获得自由的猪必须自己找食，防范人的追捕和其他动物的侵害，所以慢慢变得非常有智慧。村民们想了各种办法抓它们，都没有成功。后来，有个外乡人拉着一马车的木板和粮食路过，村民们问他干什么去，他说我要帮你们把猪圈起来。村民们说算了吧，这些猪现在可聪明了，我们努力很多次都失败了。这个人说让我试一下吧，然后就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外乡人回来了，说他已经把猪都圈起来了。村民们很惊讶，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说：其实也很简单，我一开始在地上放一点粮食，猪很警觉地过来闻闻，看看周围也没有人，经不起诱惑就把粮食吃了，然后就转回树林里去了。到了晚上，我又在原来的地方放了些粮食，但这一次，我同时在旁边竖了一块木板。第二天，猪又来了，窥视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不安全的，又把粮食吃了。就这样，我每天放一点粮食，同时加竖一块木板，猪每天都来享受我提供的美餐。木板慢慢围成了一个圆圈，猪的警惕性反倒越来越小。到最后一块木板准备好了，猪又来吃食，我就把它们圈起来了。

这个故事有两个含义：第一，失去了独立性，动物的智慧、人的智慧都会降低；第二，如果经受不起诱惑，最后就会丧失独立性。这两点对于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说必须牢记。

我相信，中国更长远的未来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中国现在非常需要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术企业家，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他们创造新的理念，新的思想，还需要有冒险精神。如果大家都不愿这么做，那就依然有可能回到历史的反复之中，改革开放只能成为历史长河里令人回味的好年景。



[【返回目录】](#)

## 许章润：稻壳、碎石子和老鼠屎

[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三会学坊 ]



本文作者许章润教授 图片来源：中评网

“流亡读书本来很苦，睡在跳蚤窝里，雪花从破窗飘进来，落在脸上，围着破棉被发抖，米饭冰冷，带着稻壳、碎石子和老鼠屎。”

上揭文字，见诸王鼎钧先生的《关山夺路》，记述的是 1940 年代的抗战流亡生活。余生也晚，得免不幸挣扎于兵荒马乱，而有幸“被抛到”伟大和平年代。抛者，借用名人名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上的”之意。但除了“跳蚤窝”一项，其余诸种，少儿年月，却也一一历验。至于米饭“带着稻壳、碎石子和老鼠屎”，习以为常，吃上就算幸运，没觉得是个事，更无从抱怨。毕竟，在我降生前夕，短短三年里，数千万同胞辗转沟壑，活活饿死！

那是 1960 年代末期至 1970 年代末期，人们尚未走出大饥饿的阴影，感谢上苍终于又能吃上饭了。一日三餐，母亲淘米前，先要千挑万捡，把“稻壳、碎石子和老鼠屎”剔除。下河淘米，再单手捏拢或双手合掌，反复揉搓，或用箴篮上下震荡，希望筛选出漏网的碎石子、砂砾与草屑木屑。

通常较易剔出颜色偏深的碎石子，但细碎如沙，浅白或者灰色的，则多半成为漏网之鱼，潜伏着伺候肠胃。有时母亲让我先在淘米篮里找找，每次轻易就能划拉出若干“稻壳、碎石子和老鼠屎”。此不过一餐之粮，长年累月，千门万户，该有多少。

将盛米的竹篮放在腿上，低眉埋首，用心挑拣，这样的时光，仿佛昨日，是我少儿岁月里为数不多的温馨记忆。



王鼎钧先生画像

每次吃到一粒石子，磕牙，赶紧吐出，而为连带吐掉的米粒惋惜。也有吃得猴急的，磕巴一声响，石子磕破牙唇，血丝殷殷。至于稻壳与老鼠屎，剔出就是了，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凡此饭中三宝，有时独自登台，有时联袂出演，几乎每天都来打个照面，家常便饭，没人吐槽。顶不挤，石子磕进牙缝了，骂一句天娘老子。

不是天地不仁，而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今天读到王先生的文字，这才想起自家的往事，恍然已有许多年不曾再吃这样的饭了，好像都忘记了。人真是个趋利避害、一心向往快乐的生物，哲学家们笔下的“乐感文化”，振振有辞，煞有介

事，其实哪里只为我华夏子民所独宠呢！所以便又有哲人说，人类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曾汲取任何历史教训，而徒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饭中有三宝，原因有三。一是当年粮食晾晒加工条件有限。二是国家下拨给农村居民的“商品粮”多为次品，印象中永远是陈粮，时有乳白色的米虫翻滚其中。所以收获季节，多半是酷夏时节，偶得亲戚乡民馈赠两斤新米熬粥，便为珍馐。三是粮站贪污。如何填补亏空？除开售卖之际缺斤短两，便是往米中掺杂“稻壳与碎石子”。据说圆明园断垣残壁的汉白玉石柱石墩，数十年里为乡民捣碎，掺杂进稻米，养活了几代人。此刻粮站拿工资的，无此幸运，穷乡僻壤，手边也没汉白玉，但碎石子满世界不缺。稻壳麸子本来用于喂猪，比大米价格低得多，掺进米里充数，反正吃不死人。还有，公粮没人心疼，我几次去粮站扛米，在粮仓铲米，亲见硕鼠丰满，纵横捭阖，在那个人类吃不饱的年代，它们个个脑满肠肥，贼眼骨碌碌，嘴上的胡须亮晶晶，一群一堆，仿佛天天开趴頹。

那时乡民评价一个人生活好，甚至于长得好看，就说他或她“过得白白胖胖的”。今日动笔作文，想起那粮仓硕鼠，好像似曾相识。再一寻思，发觉与当年有幸见到的几位倒了霉“下放老干部”，颇有形似，复兼神似。

岁月何所寄，沧浪笑谈中。东瀛读书偶感，作此千字文，要是有所得罪，大夏天的，在下恳劝您可别生气啊！ 🍵

2018年7月于东京旅次

[【返回目录】](#)

## 郭于华：OMG，傻“幸福”又来了！

[ 郭于华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首发于 2008-02-04 作者博客，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本文作者郭于华教授

这几年每至岁末年初、总结“预测”之时，总会看到一堆关于“幸福感”的东西：

先是 2005 年我们被权威学术机构告知：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2005 年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 2004 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同期还有《2005 中国女性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统计出“小城镇和农村女性比城市女性更知足更幸福”的结论。

第二年“幸福感”又加上了“满意度”——专家们告诉公众：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较上一年有所下降，但连续 5 年，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水平高于城市居民；73%以上的城乡居民对未来生活持乐观预期的态度；七成以上居民感觉生活幸福，其中小城镇居民幸福感最高，农村居民次之，城市居民最低（《社会蓝皮书 2006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接下来的一年，这个“蓝皮书”又发布说：去年中国居民对自己生活的总体满意度达到 3.47 分，和 2005 年相比高 0.07 分；在 2000 年至 2005 年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相对高于城市居民。而在 2006 年，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农村居民与上年基本持平，城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首次超过农村居民。（仅在一

年中农民的幸福感就不如城里人了，也不知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同时占九成左右的城乡居民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持乐观态度。



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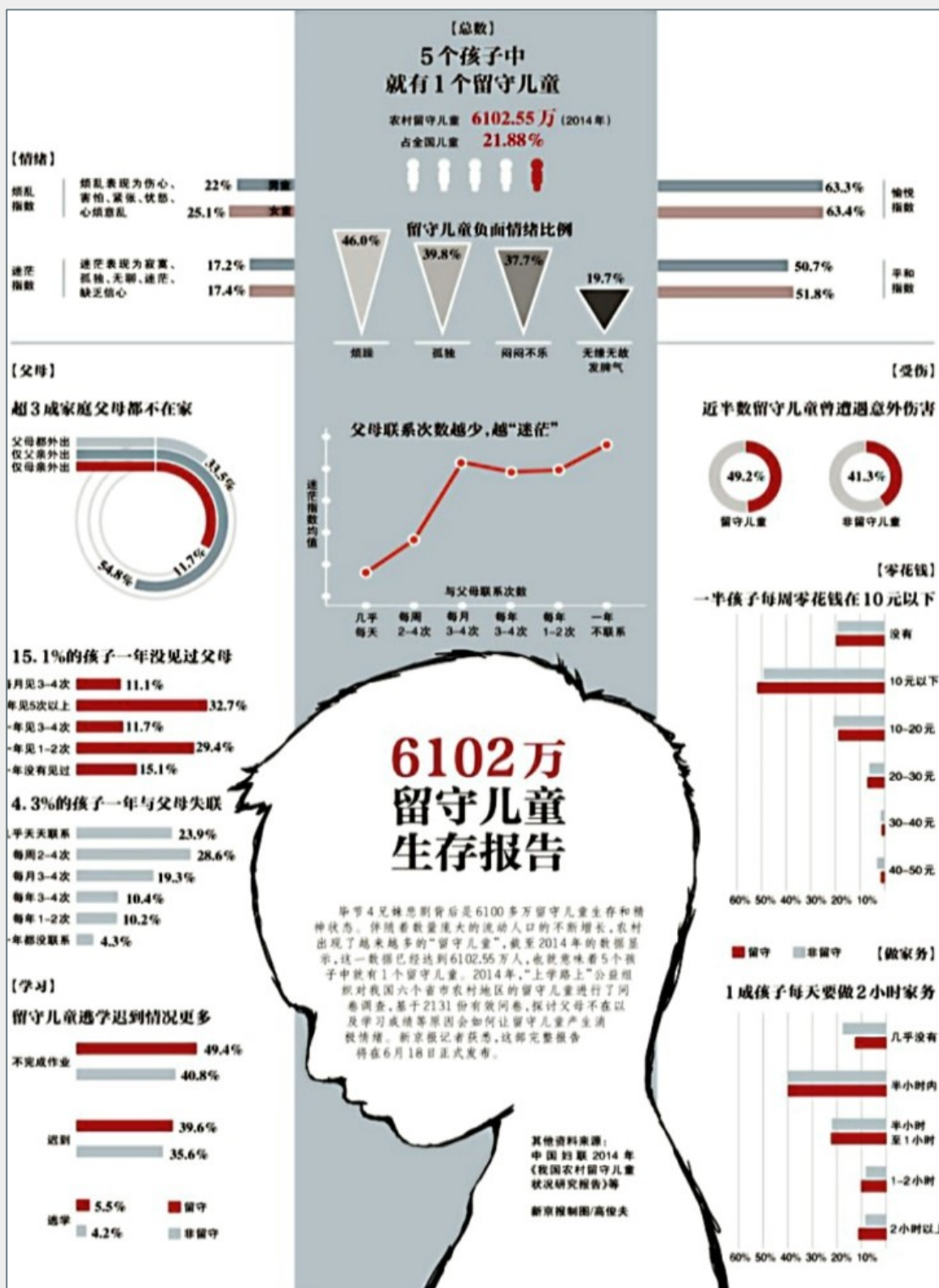


进城打工的山东农民

新年伊始，又出了一个“幸福指数”。最新的“社会蓝皮书”倒似乎是没太强调幸福感、满意度之类的东东，但人们却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幸福指数》中读到：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总体幸福指数达到72.44。有近六成的居民表示自己生活

得幸福或比较幸福，仅有 2% 的人觉得自己很不幸。特别是北京女人比男人感觉幸福；15 岁以下 60 岁以上的居民幸福指数高达 80 以上；中青年幸福感最低，与少年和老年人相比相差 10 个百分点。

### 6102 万留守儿童生存报告



截止 2015 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 6100 多万，其中独居留守儿童已达 210 万，与同龄的城市孩子相比，他们不仅缺少优良的教学资源，健全的医疗制度，父母难于陪伴，是留守儿童丧失基本的家庭成长环境的严重问题。资料来源：新京报



中国儿童自杀率为世界第一，其中大量是农村留守儿童，  
2010年陕西凤县杏林镇5名小学六年级学生为何相约在古庙喝农药自杀，  
幸得过路村民发现及时送医，5个孩子中4个是农村留守儿童；  
截止2015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100多万，其中独居留守儿童已达210万，  
留守儿童中多数患有心理疾病、不可逆的智力发育迟缓和人际沟通障碍，抛开因缺乏监护人意外身亡的，  
儿童自杀在留守儿童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2008年安徽少年因思念父母自杀；2009年留守女高中生结伴烧炭自杀；  
2010年4名留守儿童相约喝药自杀；2011年3名留守儿童相约喝药自杀；  
2012年留守农妇携3名孩子服毒自杀；2013年两留守儿童相约服药自杀；  
2014年安徽9岁男童放假当天自缢身亡，事发前听说打工母亲过年不回家；  
2015年贵州毕节一家4名留守儿童留下遗书服农药自杀身亡，最大哥哥13岁，最小妹妹仅5岁；  
2016年1月23日皖鄂赣三省交界的望江县9岁的留守儿童小闯因母亲“过年不回家”自缢身亡；  
2016年10月8日江西赣州兴国县留守儿童光明（化名）在作业本上留下的遗书跳水库自杀溺水身亡；  
2018年7月8日四川代寺镇留守儿童小兰在邻居家屋外的一棵大树上吊自杀身亡……  
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调查，  
大约有34%的留守儿童有自杀倾向，19%的孩子做过自杀计划，9%真的实施过自杀；  
另外有70%以上有程度不等的心理问题  
(数据来自 NGO 组织“上学路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

看到这样一堆“幸福感”、“满意度”、“幸福指数”之类的东西（其实觉得它们实在不是东西!），让人最先联想到的是法国社会思想家布迪厄的“社会巫术”概念：布迪厄强烈质疑和批判的作为“社会巫术”的民意调查，指的是以“强加的问题、貌似合理的技术，用一些被调查者不用的字眼，提一些被调查者一般并不会提出来的问题；而被调查直到问题摆在了面前，面对调查者的催促和逼迫，才会并不情愿地给出一些牵强的答案”。这在布迪厄看来“不过是蛊惑人心的伪科学”和政治领袖们乐于借来进行治理的“巫术”而已（布迪厄，1998，262）。布迪厄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些操弄“社会巫术”的专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缺乏了解，全然不顾对民众的责任和义务，通过貌似科学的手段和集体性的话语制

造出掩盖社会疾苦的政治幻象。



2011年5月23日，来自西班牙的一对夫妇在南昌一宾馆大堂和刚领养的女婴，当天从南昌市收养中心走出四五十名外国人，他们怀中多抱着一岁左右的中国婴儿；

中国涉外收养伴随着计生委的操控已近30年，是世界上最大的送养国之一，自1992年以来，共计有12万中国儿童被美国人领养；一些地方福利院向人贩“收购”婴儿，据财新报道，“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速包围目标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赎回小孩的惟一条件就是交钱”；

此外，“儿子走了找老子，老子跑了拆房子”、“2000年以后，不砸房子了，‘没收’小孩”的标语，堪称惊悚恐怖影片题材，

收养家庭须向福利院捐款，数额已从3000美元涨为35000元人民币（以当年汇率约5400美元），每份领养协议都有“乙方自愿向甲方捐赠35000元”的字样，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已与17个国家有领养关系，也是美国最大的儿童送养国，

2016年湖南邵阳计生部福利院以“超生”未交“社会抚养费”为名，强抢孩子当“货源”已成为国际丑闻，时至今日，全国计生委犯下的滔天罪行未被清算，成为法治真空地带

之所以说是幻象，是因为这种调查结果与社会事实反差巨大。我们每天耳闻目睹、感同身受的种种贫困、痛苦、愤懑和不公这些调查者们看不见或不想看见，种种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物价全面上涨、社会治安恶化、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成千上万的人民在春运的严峻形势下颠沛于路途……他们也不关注，却千方百计地寻找“幸福”“满意”，还弄出又是“感”又是“度”又是“指数”的科学、统计来包装，实在有欺上瞒下、制造蒙昧之嫌。而此幻象和蒙昧也同时造成了当今社会科学的深刻危机。

面对如此社会调查我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按照这类调查的结果，怎么越是弱势者越感觉幸福？相对于城里人，农村人幸福感更强；相对于富者，贫者更满意更知足；相对于一个男权社会中的男人，明显遭受性别歧视的女人更感幸福；相对于强壮的中青年，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幸福指数更高（高出10个百分点）。真是奇了怪了，越穷越开心，越弱越幸福，怎么看怎么想都觉得这事不对劲。对此调查者解释说：“调查结果显示，幸福感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而有钱不等于幸福，财富仅仅是带来

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废话！这难道就是做了一大堆问卷、加上多元统计分析、呈上 N 多公式、数表、抽样方案所要证明的吗？这不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吗？我以为，关键是幸福与否、满意与否这样一些心理感受却被这些调查者作为社会事实来操弄。如此实在是侮辱弱势群体——他们不光穷，而且蠢；不仅低收入、低消费，还穷开心、傻幸福。（我 KAO，实在忍不下去了，这些人怎么自己不去过这种“幸福”生活？）

最后还有一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样的“调查研究”到底想干什么？媚上吗？当政者也不会智商这么低吧（想到此，这类调查还有污蔑当局之嫌）？蒙下吗？看看网民的痛斥就知道老百姓如今也不好糊弄了。况且真想欺上瞒下也该敬业一点，有点创意行不行？增加点“技术含量”好不好？赵本山演小品还知道“拐一年，车一年”，年年有进步；堂堂学者就会“幸福一年，满意一年”，最多再添个“指数”，年年老套套。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官员拿到这个“科学”“学术”的武器如获至宝，当成操控民意的工具、标榜政绩的指标，这可是政治的弊端和学术的耻辱。因为它会导致为政者不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上做工作，而专在提高人民幸福感、满意度上下功夫。

我忍不住想说的是：我代表不了失业下岗工人、我代表不了农民和农民工、我也代表不了城市中生活贫困或者财产权受到侵犯的居民.....，但我要代表我自己，一个收入应该在中等以上的公民，对这些非要代表我还说我很幸福的家伙们说一句：不！别把 TMD 幸福感强加给我，幸福不幸福、满意不满意，那是我自己的事。你们那堆 #·¥%—+|\*\$ 的破烂，我呸！别再拿来侮人辱己了！ ■

2008-1-29

[【返回目录】](#)

## 陈剑：请把生育权归还给公民：谁来定义生育权的归属？

[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2015年，在中国计划生育史上应当是看作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施行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再到80年代初推行的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紧缩性生育政策，再到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紧缩性生育政策前后持续了35年。虽然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决定，但毕竟是一个符合民意、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的正确决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放开二胎，实际凝聚了诸多人士，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学者等有识之士多年努力的结果。由于笔者近年来也竭力为放开二胎做出努力，因而较为熟悉为放开二胎而做出贡献的人们。笔者在2015年10月30日撰文，“为推进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而做出不懈努力的人们”中，列出了近年来为推进放开二胎而做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北京大学的穆光宗教授无疑是属于为放开二胎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



《人口生态重建》

穆光宗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笔者与穆光宗教授认识整 30 年。穆教授 1985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后，开始进入人口学领域，从中国人民大学到北京大学，工作单位都是人口研究所，硕士、博士、博士后一路读来，除了获得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外在头衔之外，穆教授长期且勤奋耕耘(这其中勤奋十分关键)，学问更深了，也更接地气了。诸多观点不仅富有新意，也更具系统性。由于长期关注人口与计划生育，特别是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诸多弊端有系统性研究和深刻认识，扎实的理论素养、对实际工作的了解和开阔的视野，这使得他多年来为呼吁放开二胎有着坚实基础，并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



《人口生态重建》一书的作者、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

长期紧缩性的生育政策导致人口结构性失衡对中国未来长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这些问题，至今并没有多少人有深刻认识，更不用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了。穆光宗教授 2016 年 1 月所著的《人口生态重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书，则从多角度、全方位对未来人口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以警示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口生态重建》一书，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提出了当下中国人仍需要高度关注的人口问题：

### **推行紧缩性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作者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论述了长期推行以一个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紧缩性生育政策所带来的危害。强制性和风险性，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特征。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政策实施突破了“生育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底线，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失衡，少儿人口比重的下降和人口快速老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多方面挑战。穆教授把这方面的挑战定义为中国新人口危机。具体内容包括人口萎缩、人口失衡、人口亏损、人口老弱等人口问题，其根源是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的进程。例如，中国 0-14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从 1982 年的 33.6% 下降到 2000 年的 22.80%，2010 年的 16.6%，属于严重少子化。2010 年上海 0 至 14 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甚至只有 8.63%。此外穆教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较为系统，也有新意。中国人口老龄化不

仅具有未富先老的特征，缺乏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持，其人口学特征也十分令人担忧——这就是宏观上的少子老龄化、微观上的独子老龄化甚至无子老龄化，至于空巢老龄化、失能老龄化等也是很强的趋势，但却缺乏应对的人力资源。过低的生育率和少子化趋势是人口带来诸多挑战的根源。

穆教授认为，中国将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和痛苦社会，人口萎缩趋势和惯性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将在可预见的将来沦落为又“小”又“老”的国家，大国地位今后将受到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可归纳为发展动力问题、社会和谐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这三大问题可看作是作者近年来一直呼吁放开二胎的理论支撑。虽然二胎已经放开，但上述问题的严峻性没有丝毫减弱。

穆教授上述观点振聋发聩，笔者完全赞同。中国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诸多的社会问题日益显露。笔者在 2014 年 10 月 8 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研究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意义”。文中指出，“在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再过 15 年左右，虽然专家们测算的数字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到 2030 年时养老金缺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人认为超过人民币 60 万亿元以上，占当年 GDP 三成左右。虽然这一数据的具体数值可能存有疑问，但养老金缺口持续放大对财政造成巨大负担这一总体趋势是确定的”。因而，面对中国人口快速老化，即使现在未雨绸缪，我们已难以找到很好的应对之策。

### **中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人口学是一门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且深入进去才能有所理解的一门学问。其表象和人们对其认识往往有所误差，时间上也往往存在一定时差。社会上关于生育率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很多人以为放开二胎似乎就可以提升生育率。穆教授在书中所揭示的观点是，中国已经掉入内生性低生育率陷阱，其特征为文化性、意愿性、内生性。即便政府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很多年轻夫妇也会望而止步，这已经成为生育新常态。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将进一步趋缓，直至迎来人口负增长。并认为，“现在新生代人口中间已经形成新的生育文化，这就是选择性独生的低生育文化甚至不生育的丁克文化”。

穆教授上述认识十分到位。中国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口学者的共识。笔者近期也多次接受媒体专访阐述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并与穆光宗教授观点高度吻合。即已经进入低生育率的中国，即使放开二胎乃至全面放开也难以避免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全球进入超低生育率的国家，也都呈现出上述特征。例如，2013 年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妻生第二个孩子，专家曾预计 2015 年将比 2014 年多生 100 万婴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5 年中国的人口最新数据则说明，新生儿数量不但没有达到预计数，还比 2014 年减少了 32 万。说明中国高生育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拯救失独家庭是政府责任**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这是穆教授多年来强调的观点。风险性也是强制性生育政

策的主要特征。以穆教授看来，紧缩性生育政策最大的风险莫过于失独风险。这样一种认识有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根据全国性卫生年鉴统计，每年失独家庭增加 7.6 万个。全国目前有 2 亿以上的独生子女家庭，预计全国有近 1000 万个失独家庭。作者认为，“预防失独”和“救助失独”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但首先是政府责任。因为紧缩性的生育政策，即强制一胎化做法导致了失独的政策性风险。“失独家庭”是为国家人口控制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付出了牺牲的特殊群体，政府理应落实贡献者奖励、牺牲者补偿的人道原则。为那些可以再生的家庭在经济上补贴、技术上支持、精神上关爱；为无法再生育的失独父母解决“老有所依”、“老有所靠”、“老有所亲”等多方面养老和精神需求。应当参照最低生活标准，大幅度提高失独父母“生活保障金”。

笔者赞同穆教授上述观点。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笔者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这一时段可以看作是在紧缩性生育政策实施初期。那时这一群体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显现，失独家庭问题的应对也没有纳入政策制订者视野。随着紧缩性生育政策的实施，这一特殊群体规模日渐增大，他们的问题逐渐显现。这一群体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他们目前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政府部门也应当为想方设法给予解决，解决他们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而不能对这一群体困难视而不见，只要求他们做牺牲和奉献，而没有任何补偿和救助。

### **取缔社会抚养费**

计划生育的超生罚款随意性很强，其弊端十分显著。2002 年 9 月 1 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超生罚款自此被“社会抚养费”这一法律表述所替代。穆教授对对社会抚养费征收的理由、征收的标准以及现实中情形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应当取缔社会抚养费。并认为，国家曾明文表述生育权是基本人权，这与社会抚养费征收本身就自相矛盾：第一个孩子没有社会抚养费，所谓超生的第二个孩子哪里来的社会抚养费？儿童福利院弃婴的抚养才需要社会抚养费，但这是人道社会和责任政府应有的担当，。一些地方乐意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因为有利可图。或用之于请客招待，或者建房盖楼，或者改善待遇。此外，“社会抚养费”制造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黑户人口问题，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这一群体人口高达 1300 万。如果不交罚款，黑户人口就无法获得正常的社会身份，无法上学就业享受社会福利，成为被社会隔绝的另类人口。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使很多超生家庭的生计几到崩溃边缘。为了解决超生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穆光宗教授的结论是，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的修订不是真正造福人民，而是固化了鱼肉人民的恶政。应当坚决取缔。

放开二胎后，虽然行政主管部门仍然在继续征收社会抚养费，诸多专家学者们对此都有较为强烈的质疑，但穆教授的分析更为直接和具体，理由也是能成立的。放开二胎后，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利弊做出一个综合分析，如果视野能够开阔，从尊重公民生育权利着眼，笔者认为取缔

社会抚养费已到时候。

## 尊重公民生育权利

中国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展计划生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看来,党和政府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推行的“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不仅生育效果好,也更符合公民自由生育的人权法则,并得到世人普遍赞誉。但十分遗憾的是,这一很好的“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被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推行的紧缩性生育政策所取代,前后历经 35 年时间。2015 年 4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笔者所著的《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9-1991)》,对“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被取代作了详尽分析。现在看来,紧缩性生育政策社会代价极其巨大,政策执行效果也不尽人意。特别是与公民自由生育权利相违背,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极为显著。例如,黑户人口、暴力执法、强制堕胎等等。穆光宗教授在其著作中反复阐释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生育权是天赋人权,是自由人权,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法则,也是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中国不能自外于生育文明进步的潮流。人民是权利主体不是义务主体,政府是服务主体而不是管治主体。生育决策的主权应该还给公民,同时将“公权力关进笼子”,不得任意践踏和剥夺独立自主负责的生育私权。同时,政府应该加强计划生育的技术服务、计生家庭的社会保障和人文关怀。穆教授认为,尊重公民生育权利,结合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严重失衡,政府应当“全面鼓励二胎、多胎不限(避免堕胎)”,更有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并焕发出人口对未来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积极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是不承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才知道并懂得尊重人权,对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极端重要性。2004 年才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庄严的宪法。十年之后,2014 年党的 18 届 4 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人权意识是法治意识的基础,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使命的核心所在。而生育权则是人权的基本内容。生育权说到底就是天赋人权。自 1968 年德黑兰国际人权会议以来的历届国际人权会议对此都有阐释。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保障公民的生育权利落到实处。这个问题实际很简单,就是让公民和家庭自主地决定生育数量,把生育权归还给公民个人和家庭。政府可以提供,更重要的是做好生殖健康服务。而不是对公民的生育权利进行管制。

实际上,把生育权归还给公民个人,就当下的中国整体发展状况,不仅不会导致生育率的反弹,只会缓和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状况。实际上,人类对自身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至今并不十分清晰。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婴儿浪潮,全球的生育率高居 6 以上,人们对未来充满恐慌,“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等理论应运而生。随着本世纪全球的生育率急剧下降,目前全球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 2.4 左右,人们对“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一经典论断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而中华文化圈(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大陆、马来西亚的华人)生育率已经下降到全球最低行列,人们在探讨为什么

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为何如此低的同时，不得不质疑紧缩性生育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效。也就是，党和政府投入了巨大人力财力，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到底取得了一个怎样的成效呢？我们如何科学评估 35 年紧缩性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整体效应？35 年的努力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等等。这些质疑的产生，是基于以下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那些没有采用行政管控手段强制生育的中华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也已经降到与中国大陆(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是总和生育率为 1.18)相近的水平。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应当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同样值得我们探讨的是，中国 70 年代“晚稀少”的做法，在和风细雨过程中，生育率下降幅度之大，在人类生育史也是十分罕见的，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好的成效？也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一过程中几乎少有政府的强制和管控，政府只是提倡，选择的决定权在公民和家庭手中。正是基于上述国际间的比较和 70 年代“晚稀少”的史实，笔者的观点是，尽可能早的将生育的决定权交还到公民手中，既有利于提升党的 18 届 4 中全会提出的“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也有利于缓解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更利社会的和谐和中国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把生育权还给公民的这一观点，正是穆教授在《人口生态重建》一书中反复强调的内容。 罳

[【返回目录】](#)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年3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年3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年4月，「**铁路改制：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年9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年10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2015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 二. 众筹方案

2018-2019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 1. 众筹目标：3万元（2018-2019年度4-5场沙龙的总经费）

####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 3. 众筹回报:

####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 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 (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 (每期沙龙仅一位):** 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 (全年仅一位):** 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 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 861581962310001 (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 [wistom113@163.com](mailto: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 2018-2019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 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微信公众号: 云豹 ONE(ID:chinareview1)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nGlllI-5ehNtyrler9dKw> 密码: t9ed